

中国劳动人民 革命哲学史略

(讨论稿)

湖北省襄樊市工人理论小组
武汉大学哲学系七二级学员

一九七六年四月

马克思恩格斯语录

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

哲学是在它的敌人的叫喊声中进入世界的；然而就是哲学的敌人的内心也受到了哲学的感染，他们要求扑灭思想火焰的求救哀嚎就暴露了这一点。

列 宁 语 录

马克思最重视的是群众的历史主动性。

经过几十年和几个世纪的酝酿而成熟起来的矛盾，都在革命过程中浮现出来。生活变得非常丰富。一向不露头面因而常常被肤浅的观察家所忽视甚至轻视的群众，以积极的斗士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这些群众在实践中学习，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迈着试探性的步伐，摸索道路，拟定任务、检验自己和自己

的一切思想家的理论。

剥削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本身和个别“知识分子”代表中间产生一些与这一制度相反的理想。……这些理想对马克思主义者说来是非常宝贵的。

毛 主 席 语 录

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曾经是世界上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千百年来梦想。

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目 录

前 言	(1)
一、殷周时期奴隶们“开天辟地”的哲学寓言	(8)
古代神话中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萌芽	(9)
奴隶们创造的原始“五行”，“阴阳”说	(12)
古代民歌中劳动人民反天命、反剥削和向往自由乐土的思想	(15)
二、奴隶起义领袖柳下跖对剥削制度和反动孔学的哲学批判	(18)
“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的社会理想	(19)
蔑弃“鬼事”、不信“天命”的战斗无神论	(21)
“非圣”、“薄古”的历史发展观	(23)
为奴隶革命服务的道德学说	(25)
三、春秋战国时期劳动人民反孔批儒的哲学战斗	(29)
反对“生而知之”，主张“身观”“亲知”的认识路线	(29)
反对屈从“天命”，主张发挥“人力”的劳动哲学	(33)
反对“厉民自养”，主张“君民并耕”的政治理想	(36)
四、秦末农民革命领袖陈胜、吴广“王侯无种”的反天命思想	(40)

“氓隶之人”“宜为王”的夺权思想·····	(41)
否定天命神权和世袭特权的“王侯无种”论·····	(44)
坚持“吾自举”，反对“法先王”的革命历史观·····	(47)
五、汉末黄巾军破“苍天”、立“黄天”的革命辩证	
法·····	(49)
反压迫、反剥削的“太平”理想·····	(50)
反天命、反神权的“贵贱由人”论·····	(53)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社会革命论·····	(55)
六、隋末农民起义的发动者王薄的“世事可知”论和暴	
力革命思想·····	(58)
“世事可知”的朴素唯物主义·····	(59)
“提刀向前”的暴力革命思想·····	(61)
七、唐末农民革命领袖黄巢的“均平”纲领和“冲天”	
哲学·····	(64)
“问罪”天子的农民革命路线·····	(65)
反对封建制度的“均平”纲领·····	(67)
敢于“冲天”的战斗唯物主义·····	(70)
八、宋代农民革命领袖方腊的“法平等”思想和“明	
暗”转化的发展观·····	(73)
摧毁封建法权的“平等”纲领·····	(74)
对唯心主义理学的革命批判·····	(77)
“明暗”对立转化的辩证发展观·····	(79)
九、元末红巾军“杀尽不平方太平”的革命逻辑·····	(82)
“挑动黄河天下反”的革命预见·····	(83)
“民起怨，事必变”的辩证历史观·····	(85)

“摧富济贫”、“杀尽不平”的暴力革命论·····	(88)
十、明末闯王李自成“射天”、“除暴”的战斗唯物主 义·····	(91)
“除暴”、“均田”的反封建纲领·····	(93)
“闯”字当头的战斗唯物主义·····	(96)
战略战术中的朴素辩证法·····	(99)
十一、太平天国革命英雄“杀绝妖魔”的斗争哲学·····	(104)
“灭清开国”的暴力革命思想·····	(105)
“共享太平”的空想社会主义·····	(109)
“革故鼎新”的社会变革思想·····	(111)
十二、义和团、红灯照“扫清灭洋”的革命哲学·····	(115)
“扫清灭洋”的反帝反封建纲领·····	(115)
“不怕鬼”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117)
人分穷富，团分真假的辩证分析法·····	(121)
结 束 语·····	(124)

前 言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国各族人民的祖先在亚洲东部广阔的土地上战天斗地，经历了五十多万年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到四千多年前，才进入阶级社会。我国阶级社会的历史，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奴隶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

（毛主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从柳下跖抡起金锤，宣判了奴隶制的灭亡；大泽乡一声惊雷，粉碎了复辟狂的迷梦；直到太平军、义和团的英雄们，高举“灭清”、“灭洋”的反帝反封建大旗，掀起了人民革命的怒涛。几千年来，在苦难中不断觉醒的劳动人民，不仅对于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实行了猛烈的武器批判，摧毁了一代代反动王朝，而且对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反动统治思想及其哲学基础，也展开了革命的大批判，在斗争中锻炼出了锐利的思想武器，自己的革命哲学。

毛主席说：哲学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广大劳动人民作为人类认识的主体，在长期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也“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实践论》）这就是劳动人民哲学产生的基础。首先，在生产实践中，劳动人民通过改造自然的艰苦斗争，不断加深了对自然界及人和自然的关系的认识。从“开天辟地”的神话，到原始“五行”、“阴阳”学说，表明古代劳动人民对于劳动创造世界，对于世界由物质构成并充满着矛盾

运动等客观真理，早已形成了自己的朴素反映。其次，在反抗剥削、推翻反动统治的阶级斗争中，劳动人民运用自己的思想武器，对反动统治阶级的宗教鸦片、哲学谎言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从而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世界观水平。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名声若日月”的奴隶起义领袖柳下跖，对孔老二这个“巧伪人”及其“擅生是非”、“妄作孝悌”的反动哲学所展开的愤怒批判，就在哲学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开创了我国劳动人民善于运用自己的批判武器从思想上打击敌人的光荣传统。在长期封建社会中，由于封建统治者仍然把孔孟之道当作他们统治思想的核心，他们炮制了“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条极大的绳索，用来捆绑劳动人民的手足，并编造了关于“天命”、“天理”等大量唯心主义谬论，妄图禁锢劳动人民的思想。所以，历代的革命农民都高举反孔斗争的大旗，成为反孔斗争的主力军。在斗争中不断发展了反天命的战斗无神论和朴素唯物论思想，并始终坚持了反中庸的辩证发展观和暴力革命论。由于反动派总是使用镇压和招安的两手来对付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因而，劳动人民在同敌人的招安策略和内部的投降派所鼓吹的“顺天”、“护国”之类的叛徒哲学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发展了自己的斗争哲学。总之，劳动人民通过这些斗争实践，日益提高了他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水平，形成了劳动阶级自发坚持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世界观基础。劳动人民的革命哲学，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孕育、产生；并在每一次革命高潮中，作为群众的智慧结晶，作为战斗的思想武器，通过劳动人民自己的领袖、思想家的概括和总结而集中地表露出来。

区别于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劳动人民的哲学在政治方向、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上，都具有自己的特点。

毛主席教导说：“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劳动人民革命哲学的政治灵魂，是由他们的革命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奴隶和农民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就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共同劳动的“太平”世界。这种从平均主义出发的、幻想消灭剥削压迫乃至消灭私有制的社会理想，尽管“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但“在世界历史上却可以是正确的”。（列宁：《两种乌托邦》）因为它反映了劳动人民的革命愿望，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正如恩格斯在分析十六世纪德国农民战争的革命传统时所指出的：历史上劳动人民“所怀抱的理想和计划，常常使他们的后代为之惊惧”。（《德国农民战争》）显然，这是任何剥削阶级的进步哲学所不可能达到的精神境界。

劳动人民的革命哲学是群众斗争风雨中的活哲学。它的思想内容不是书斋里和书本上的幻想和空谈，而是现实的群众革命实践的总结和指南。例如，劳动人民基于被剥削压迫的阶级地位，从现实的社会矛盾运动中所总结出的“极于下者当反上”、“杀尽不平方太平”等承认矛盾的转化和主张暴力革命的辩证法思想，虽然对社会运动的认识还停留在直观水平上，却具有极其可贵的革命锋芒。又如，劳动人民为了粉碎身上的四条绳索，在反天命、反神权和批判“三纲五常”、“上智下愚”等儒家反动的说教斗争中，提出了“王侯无种”、“世事可知”的唯物主义观点，使广大劳动人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自称“巨人”，敢于“冲天”。这种“打倒天”的唯物主义，虽然还是自发的、朴素的形态；却具有无所畏惧的战斗风格。正因为如此，劳动人民的革命哲学，以最简明的论纲，集中了群众的要求，反映了时代的潮流，往往能够抓住当时社会

最本质的矛盾，因而能击中反动哲学的要害，表现出任何剥削阶级的进步哲学所不可能具有的认识水平和革命的批判精神。

劳动人民革命哲学的形式是多样的，根本不受剥削阶级传统哲学的烦琐、僵化的体系的束缚。写在起义旗帜上的口号、纲领，进行鼓动的歌谣、寓言，揭露反动派的革命檄文、政治神话，以及利用宗教外衣的“异端”等等，都是古代的“**人民文化英雄**”用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的生动形式。正因为这样，劳动人民的革命哲学能够口耳相传，不翼而飞，与广大的群众实践密切联系，从而发挥出“一呼百万”的巨大动员、组织作用。

历史上劳动人民革命哲学的存在和发展，引起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极端恐怖和仇视。在奴隶社会，孔老二就一再惊呼：“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小人反中庸”“而无忌惮”，表明奴隶们早已拿起了反天命、反中庸的批判武器，并使奴隶主们胆战心惊。到了封建社会，封建统治阶级的哲学卫士，全都把扑灭农民革命哲学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他们总结出的反革命经验是“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因而，对每次农民革命，除了军事镇压之外，同时还实行文化围剿。他们用尽各种手段来销毁、磨灭宣传农民革命思想的各种文献；然后，又宣称农民群众是“下愚”、“群氓”，根本不可能有哲学思想。资产阶级及其哲学教授们，也一贯坚持反动的唯心史观，把自己的哲学冒充为“全民”哲学，吹嘘自己是具有“批判头脑”的“精神贵族”，诬蔑劳动人民群众是“精神空虚”的“芸芸众生”，把劳动群众排斥在所谓“哲学殿堂”之外。千百年来，地主资产阶级的专制主义，就这样一笔抹杀了劳动人民的哲学在哲学史上的地位。这是不能容忍的。

恩格斯指出：“**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用马克思主义

占领哲学史阵地，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原则，坚持奴隶们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肯定卑贱者最聪明，劳动人民有哲学，恢复劳动人民的哲学在哲学史上的固有地位。为了实现这一任务，重新搜集、认真发掘长期以来被统治阶级掩埋了的有关历史资料，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是十分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必须彻底批判封、资、修的反动哲学史观，彻底破除哲学史研究中长期形成的否认劳动人民有哲学的种种传统偏见。

有一种偏见认为，以往劳动人民没有文化知识，所以不可能有哲学，这是把更好地表达和研究哲学的文化条件，错误地夸大为产生和形成哲学的前提。其实，是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出哲学，而不是文化知识出哲学。劳动人民从来都是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主体，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他们具有丰富的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随着实践的发展，适应斗争的需要，而不断地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概括和总结。毛主席教导说：“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新民主主义论》）“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实践论》）历史上被压迫、被剥削而始终坚持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的劳动阶级，当然有自己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真知”，有自己的主义，有自己的哲学。在旧社会里，劳动人民被剥夺了享受文化教育的特权，可是统治阶级的文化奴才们，却偏偏要向他们灌输剥削阶级的那套反动的哲学思想，他们大声疾呼要“化民成俗”，要“破心中贼”，要用“天理”去征服“人欲”，用“道心”去钳制“人心”。这正好说明，劳动人民心中自有一套与他们吃人的“天理”、“道心”针锋相对的革命道理，自有一套反抗剥削压迫的斗争哲学。

另一种偏见认为，劳动人民反压迫、反剥削的纲领口号等只是一些政治观点，不是哲学。这是把政治和哲学截然割裂，并把资产阶级鼓吹的虚伪的超政治、超功利的所谓哲学标准，用来衡量劳动人民的革命哲学。哲学斗争和政治斗争从来是密切结合的。任何政治纲领、口号都以一定的哲学作为理论基础，任何哲学都是它所属阶级的政策的特殊形态，都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服务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分化，本来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古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生产规模决定了各门学科还不可能有详细的分工。即使古代的剥削阶级的学术权威，拥有优越的文化条件，在他们的思想和著作中，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宗教观点、伦理观点、科学观点、美学观点等等也都是混合在一起的。劳动人民的革命哲学，紧密地把哲学和政治结合在一起，这正是它的特点和优点。“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劳动人民的哲学，完全是为了改造世界而作出的对世界的说明，这种革命哲学的智慧，往往是以“简明地以政治标语的形式写在旗帜上”（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正是通过政治斗争的纲领、口号等而高度集中地表现出来。

还有一种偏见认为，劳动人民的哲学只是个别观点，不成“体系”，所以不算哲学。其实，哲学的观点和体系并无质的差别，它们之间，不存在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体系不过是某种观点的展开，而某种根本观点则是体系的核心和基石。那些成体系的唯心主义哲学，自认为是“包罗万象”的“绝对真理”，其实，恰好是阻碍人类认识发展的精神桎梏。劳动人民从革命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活哲学，言简意赅，鲜明生动，

它所表达的一些根本观点，闪耀着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光辉，恰好代表了人类认识发展的主流。

广大工农兵研究了劳动人民革命史，劳动人民的反孔斗争史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哲学史，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劳动人民“总是第一名哲学家”，宣告了剥削阶级偏见的破产。

在毛主席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指示指引下，在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学一点中国哲学史，是十分必要的。但中国哲学史的体系，却有意无意地抹杀了劳动人民的哲学在哲学史上的地位。我们编写这本《中国劳动人民革命哲学史略》的目的，是要用历史事实证明，劳动人民有自己的哲学，必须恢复它在哲学史上的固有地位。只有这样，在哲学史研究中，才能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更好地总结阶级斗争和哲学斗争的历史经验，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本书中对劳动人民的革命哲学的研究，仅仅是个开端，内容还很不完备，分析更有待深入。但我们坚信，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过程中，工农兵理论队伍同专业理论队伍相结合，共同奋斗，一部科学的以劳动人民的哲学为主体的《中国哲学史》必将编写出来。

一、殷周时代奴隶们“开天辟地”的哲学寓言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毛主席诗词，《念奴娇·昆仑》）

我们伟大的祖国，土地辽阔，历史悠久。在很早的古代，我国各族劳动人民的祖先就生活在这里，他们劳动、生息、团结战斗，度过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漫长岁月。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们同风雨雷电、洪水火山、毒蛇猛兽、酷暑严寒等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生产斗争实践中，逐步地认识自然，产生了科学思维的萌芽。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实践论》）当时，生产力水平还十分低下，人们对日蚀、地震、火山等现象还无法理解，误认为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在支配。随着对超自然力的崇拜，产生了原始宗教迷信。科学思维和原始宗教迷信就是古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胚胎。

阶级斗争出哲学。公元前两千多年，我国进入了奴隶社会。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哲学也随之产生了。奴隶主阶级在原始宗教迷信的基础上，炮制出一套唯心主义的神学天命观，作为禁锢奴隶的精神枷锁，以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在反抗奴隶主残暴统治的阶级斗争中，奴隶们以原始的科学思维为基础，创造了自己的革命哲学。

古代神话中朴素唯物主义 和辩证法思想的萌芽

四千年前，哲学上的两军对战，就是围绕着哲学家和历史家们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进行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

奴隶主阶级胡说：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上帝派遣“天子”来统治劳动人民；天生的“圣人”教民取火、盖房、打猎、捕鱼和种地，才有了人类的文明。“最后得出一个答案：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马克思、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四期上发表的书评》）

为了回击奴隶主阶级的谎言，奴隶们以原始社会为背景，创作了许多瑰丽的神话传说。其中有盘古开天辟地，有女娲炼石补天，有精卫含石填海，有大禹疏通九河，有亲自尝百草的神农，有一头撞倒不周山的共工，还有射日的后羿，奔月的嫦娥等等。这些神话传说中的英雄群象，是用劳动工具武装起来的“神”——古代劳动人民中战天斗地的英雄。这些神话表现了古代劳动人民征服自然的伟大理想，同时，反映了对奴隶主阶级反动哲学的批判。

针对奴隶主阶级的上帝创世说，奴隶们提出了关于宇宙形成的哲学思想，这形象地体现在“盘古开天地”^①和“女娲补天”^②的故事中。劳动使人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盘古，就是一个手持双斧的劳动者。他从元气中产生出来，有着“神于天，

①《太平御览》卷二引《三五历记》、《绎史》卷一引《五运历年记》

②《淮南子·览冥训》

圣于地”的创造精神，他用尽全身力气使混沌沌象一个鸡蛋似的天与地分开，然后呼吸阴阳二气，使清而轻的阳气上升为天，使浊而重的阴气下凝成地。他不断地呼吸，使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辛勤劳动的汗水就象下雨一样。他死后，双目变成太阳和月亮，四肢五体变成四极五岳，血液汇成江河，毛发变成草木，总之，一切都是这个劳动者的化身。劳动创造了世界。这个神话说明，天地日月、山河草木以至人类，都不过是混沌的元气分化形成；人类所面对的自然，是劳动的双斧开辟出来的。因此，天是物质的天，根本没有意志。奴隶们还认为天是物质的，它可以用同样的物质来修补。“女娲补天”，说的是古时候天破了一个大洞，大雨下个不停。女娲这位劳动女英雄，就采来五种颜色的石头，炼成胶糊液体，终于把天补好了。从此，早晨和傍晚，天空出现绚丽的彩霞，就是五色石放出的光彩。奴隶们这种关于宇宙形成的思想，尽管很不科学，但有力地驳斥了上帝创世和天有意志的谎言，其中包含着对自然界的朴素唯物主义的認識。

奴隶主阶级胡说，主宰一切的上帝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只能屈服，不能反抗，否则就要“获罪于天”，受到天的惩罚。奴隶们认为，天根本没有意志，是完全可以改造的物质自然界。在奴隶中广泛流传着“共工怒触不周山”^①的故事，说的是古时候有个名叫共工的劳动英雄，他力大无比，敢于战天斗地，他带领人民修筑堤坝以防河流泛滥，削平高丘去填低洼的地方，大规模地改造山河，发展社会生产。为了反抗“天”的压迫，他愤怒地用头去撞不周山，把不周山撞塌了，把撑天的柱子撞断了，使拴系着大地的绳子挣断了。从此，天向西北倾斜，日

①《淮南子·天文训》

月星辰都从东向西移动，地向东南倾斜，长江大河都向东流去。

“天”失败了。共工“死了没有呢？没有说。看来是没有死，共工是确实胜利了。”（毛主席诗词：《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自注）这个劳动人民敢于撞天的故事，不是最生动地体现了“人定胜天”的思想吗？毫无疑义，这就是在天人关系问题的论战中，劳动人民最早提出的革命哲学！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热烈称赞“共工是胜利的英雄。”（同上）

与奴隶主阶级“圣人教民”的唯心主义反动说教相敌对，奴隶们认为，从钻木取火，架木为巢，剡木为舟，农田耕作以至从结绳记事到创作文字，都是古代劳动人民的集体创造，它既不是上天的恩赐，也不是什么圣人的发明，所谓“生而知之”的圣人是并不存在的。就拿人类吃的五谷粮食来说吧，古代的神农氏，为了找到一种能够食用而且便于种植的农作物，曾经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去“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①经过千万次的实践检验，终于找到了可以种植的“五谷”，这神农氏就是古代劳动农民的化身。可以想见，没有我们祖先的奋斗牺牲，勇于实践，哪有我们今天吃的粮食？奴隶们正是以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揭穿了反动统治者所宣扬的“圣人教民”的谎言。“神农尝百草”的故事，闪耀着“实践出真知”的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辉。

马克思指出：“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神话并不是现实的科学反映。现实中既没有开天辟地的盘古，也没有一头撞倒不周山的共工。然而“它们想象出人们征服自然力等等，而能够吸引人们的喜欢，并且最好的神话具有‘永久

①《淮南子·修务训》

的魅力’”。（《矛盾论》）原因在于，它们闪耀着奴隶们改造自然，变革社会、创造历史的智慧的火花。

奴隶们创造的原始“五行”“阴阳”说

殷周时代，奴隶社会的生产力已有了较大发展，农业上有了中耕锄草，治虫和选种的经验，历法更加完备，青铜器的生产规模也更大了。随着生产斗争经验的丰富，奴隶们对自然的认识也不断深入，创造了朴素唯物主义的“五行”、“阴阳”说。

“五行”始见于《尚书·洪范》。“五行”是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奴隶们对客观物质世界的朴素反映。他们从生产实践中认识到，“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材料与人们的物质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五行”有不同的性质和作用。水有湿润和往下渗透（“润下”）的性质，农业生产离不开它；火有灼热和向上飘动（“炎上”）的特性，冶炼和烹煮都少不了它；木的特性是可曲可直（“曲直”），能制造各种用具；金的特性是坚固锐利，可以制成各种器械（“从革”）；土的功用最大，可以种植五谷（“稼穡”）。这说明，随着生产的发展，奴隶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也在前进。这种认识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性质，它从自然界本身的物质构成来说明自然界，不附加以任何神秘的色彩。

奴隶们从生产实践中还注意到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具有某种相互转化的关系，如木能生火，火能熔化金，金又可以克木等等。这些经验的初步总结，对于后来五行相生、相克的学说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五行”同人们的生活密切不可分开，奴隶们自然也用它

来表达自己的革命理想，周武王的军队直捣商朝奴隶主的老巢。队伍到达都城郊外的晚上，奴隶们欢喜若狂，载歌载舞，通宵达旦。他们唱的正是一支《五行歌》。歌词是：“勤勤恳恳，不知疲倦地劳动吧！有了水和火，我们吃喝都不愁；有了金和木，我们就能发展生产、建设新家；可爱的黄土啊，生长万物的母亲，种植庄稼全靠它。”^① 这只歌按照对“五行”的朴素唯物主义认识，来设想安排自己的生活，丝毫没有对天命的敬畏，也没有对手执皮鞭的奴隶主的恐惧，表达了奴隶们对没有剥削、压迫的新生活的向往。

“阴阳”说跟“五行”说一样，它是奴隶主阶级天命论的直接的反对物。最初，劳动人民在山坡上开荒种地，发现向着太阳的一面庄稼长得好，背着太阳的一面长得不好，因此，人们得出一条经验，种地必须“相其阴阳”。^② 在古时候，“阴”“阳”二字就是表示同一山阜的背日面和向日面。可见，阴阳对立的观念是从生产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在生产斗争实践中，劳动人民逐步地了解自然的规律性，阴阳的观念有了发展。风雨晦明的变化，日月星辰的运行，寒暑四时的更替以及大海的潮汐，江河的流行，使奴隶们苦苦地思索着其中的哲理。他们意识到，天气时阴时晴、时风时雨、时冷时热，就是阴阳二气互相消长的缘故。通过仰观俯察，长期积累经验，他们还看到，日月的运行引起昼夜的更替，寒暑的变化伴随着草木的代谢。从这些自然现象的互相联系中，他们进一步认识到自然界应按照阴阳交替的次序运行着。

“阴阳”说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西

①《尚书·大传》：“孜孜无怠，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生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是为人用。”

②《诗经·大雅·公刘》

周初年出现的占卜书《周易》中，保存了某些卜辞和民间谚语，体现了这种思想。首先，人们初步意识到整个世界是充满着矛盾的。在阴阳对立的基础上，出现了许多互相对立的范畴，如天地、男女、刚柔、内外、进退、生死、泰否、损益等等。从阴阳转化，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对立物互相转化，形成物极必反的辩证法思想。如：“无平不陂，无往不复。”^①就是说世上没有固定不变的现状，平地可以变成斜坡，发展到极点的事物终究要走向反面。从阴阳的消长，人们还认识到事物的转化有一个过程。如“履霜 坚冰至”^②就是说脚踩着晚秋的白霜就知道严冬的冰雪即将来临，从寒霜到坚冰要经过一个渐变的发展过程。又如《周易》中说的“潜龙勿用”——“飞龙在天”——“亢龙有悔”，^③也是表现事物（龙）不断发展以至物极必反的过程。从社会上君臣、上下、尊卑、贵贱的不断变化，劳动人民联想到自己被奴役的地位，坚信“否极泰来”的道理，受压迫到了极点终究要翻身。这一切都是劳动人民从对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发展趋势的长期观察得来的。这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的产生，对于整个奴隶阶级的觉醒有着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

奴隶们创造的“五行”、“阴阳”说，从根本上动摇了神学天命观对思想界的统治。就连奴隶主阶级中个别主张改革的人物也产生了对天命论的怀疑，从而试图用“五行”、“阴阳”说来解释自然现象。如西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79年），陕西一带发生地震，大夫伯阳父就说这是地底下阴阳两种物质势力的消长、抗衡和排挤所引起的，阴压不住阳，就发生地

①《周易·泰卦九三爻辞》

②《周易·坤·初六》

③《周易·乾卦爻辞》

震。^①史墨还引用当时描写地震的诗句，并吸取阴阳说而提出了“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②的异端思想。劳动人民的哲学思想直接推动了进步思想家，对于我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和科学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劳动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丰功伟绩之一。

正如奴隶们辛辛苦苦炼出来的青铜被奴隶主用来制成鍍铸套到奴隶身上一样，奴隶们创造的朴素唯物主义的“五行”、“阴阳”说，经过奴隶主阶级的篡改，成了禁锢奴隶的精神枷锁。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后来就被形而上学所代替。”（《矛盾论》）今天，必须驱散剥削阶级思想的迷雾，恢复原始的“五行”、“阴阳”说的本来面目。

古代民歌中劳动人民反天命、 反剥削和向往自由乐土的思想

奴隶主阶级对于奴隶的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激起了奴隶们强烈的仇恨和反抗。古代流传的部分民歌，反映了奴隶们反天命、反剥削、向往自由乐土的革命思想。

为了驳斥奴隶主散布的“受命于天”的谎言，奴隶们提出了“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反天命思想。奴隶们敲着土块唱道：“我们每天太阳刚刚升起就下地，直到天黑尽了才收工休息；用劲凿井才有水喝，辛勤耕种才有饭吃。‘帝’啊‘帝’！你

①《国语·周语》

②《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何曾为我们尽过一点力！”^①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帝”——天上的“上帝”和地下的“天子”。奴隶们相信的是自己的力量，而不相信有什么“帝力”。

奴隶们在民歌里揭露了奴隶主阶级残酷剥削奴隶的罪行。如《诗经·七月流火》，描写奴隶们一年四季遭受剥削的情景。男奴隶种田筑圉，女奴隶养蚕织布，劳动的成果都被剥削光了，自己吃的瓠瓜苦菜，“无衣无褐”，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地里的活干完了，还要为奴隶主打猎、酿酒、修筑宫室。寒冬来临了，奴隶们住的破漏的土屋，烂泥塞塞，烟火熏熏，也抗不住严寒，还被迫冒着风雪凿冰块，收藏起来供奴隶主夏天享用。那些年青的女奴，还要遭受奴隶主崽子的蹂躏。歌声诅咒了丑恶的现实，奴隶主的天堂就是奴隶的地狱。

不少民歌反映了人民反剥削反压迫的革命思想。奴隶们愤怒地责问奴隶主：“好逸恶劳，从不种地，为啥家里却堆满高粱、小米？贪生怕死，从不打猎，为啥屋梁上却挂满野味、兽皮？好一个正人君子啊！岂不是豪夺白吃！”^②奴隶们把贪得无厌的剥削者比作偷吃粮食的大老鼠，^③并痛斥那些残暴荒淫的奴隶主连老鼠也不如：“老鼠还有一层皮，而你们厚颜无耻到了不要脸的地步，为何还不快快给我死去！”^④奴隶们敏锐地看到了阶级社会中最基本的矛盾就是广大劳动者劳而不获和一小撮剥削者获而不劳，认识到这种社会制度的极端不合理。

奴隶们在毫无人身自由、生命毫无保障的痛苦处境中，从

①《古诗源·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②《诗经·伐檀》：“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③《诗经·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粟。”

④《诗经·相鼠》：“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来没有停止反抗，没有放弃对光明理想的追求，民歌中唱道：

“乐土啊乐土，才是我们安身的处所。在那里，我们将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再也不受压迫和剥削，再也听不到我们痛苦的哀号！”^① 奴隶们向往的这个自由乐土，在当时条件下是不能实现的，但这种美好的理想却鼓舞着奴隶们进行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

“烨烨震电，不宁不令！”

百川沸腾，山冢岑崩。”^②

这高亢的歌声与其说是描绘地震，还不如说是描绘阶级斗争的大好形势。在奴隶的反抗和斗争下，显赫的奴隶主贵族一个个垮台，至上的周厉王也被人民赶跑。不少逃亡的奴隶却获得了土地，成了自耕农。自然界在变，人类社会也在变。奴隶们欢呼天翻地覆的历史剧变，高声吟诵着：“高岸崩陷吧，变成洼地，深谷填塞吧，变成山陵。”（“高岸为谷，深谷为陵。”）^③ 斗志昂扬地投入了推翻奴隶制的战斗。在这些战斗的歌声里，我们不难发现蕴涵着奴隶们斗争的哲学。

①《诗经·硕鼠》：“乐土乐土，爰得我所；乐园乐国，爰得我直；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②《诗经·十月之交》

③《诗经·十月之交》

二、奴隶起义领袖柳下跖 对剥削制度和反动孔学的哲学批判

春秋时期，奴隶们改造自然的长期艰苦斗争，铁制生产工具和耕牛的普遍使用，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没落奴隶主阶级所拼命维护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和世袭等级特权，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桎梏。奴隶主贵族们骄奢淫逸，残酷地压榨奴隶和其他劳动者。奴隶们食不饱腹，衣不蔽体，带着足镣从事耕作及各种苦役。“王公则病不足于上，庶人则冻馁羸瘠于下。”^① 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已极端尖锐化。广大奴隶早已不能忍受这种黑暗统治，掀起了英勇不屈的反抗斗争，由集体逃亡转入暴动起义。他们以“深山、广泽、林藪”^② 为根据地，采用“兵刃、毒药、水火”^③ 等手段，向奴隶主贵族展开武装斗争。奴隶起义的星星之火逐渐发展成燎原之势，终于在春秋末年爆发了柳下跖领导的有纲领、有理论、有组织、有计划的奴隶大起义。

柳下跖姓展名雄，鲁国柳下（今河南濮阳柳下屯）的赤脚奴隶。他是在奴隶起义的伟大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伟大人物，一位象雄鹰一样展翅高飞的奴隶起义领袖。他的思想象“涌泉”一样喷射，意志象“飘风”一样回旋^④。在反抗奴隶主的斗争中，他是一位胜利的英雄。他不仅率领奴隶起义军“横行天

①《荀子·正论》。

②《吕氏春秋·安死篇》。

③《墨子·兼爱下》。

④“心如涌泉，意如飘风。”《庄子·盗跖》

下，侵暴诸侯”^①，用革命暴力四处摧毁奴隶主贵族的统治；而且善于运用批判武器，把复辟狂孔丘的反动谬论驳得体无完肤，动摇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为我国劳动人民的反孔斗争揭开了序幕，树立了光辉榜样。

“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的社会理想

我国奴隶社会，奴隶主贵族推行“井田制”，占有全国土地和奴隶，对奴隶进行残酷的压榨和掠夺。奴隶们在宗法等级的法权统治和“田畯”、“监工”的鞭子监督下，进行强制性劳动。各级奴隶主贵族从奴隶们身上榨取了“千仓万箱”的财富，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奴隶们被奴隶主廉价买卖、任意屠杀，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我国奴隶社会就是这样一个极端残酷、野蛮的阶级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奴隶阶级是最受剥削压迫，同时也最具有反抗精神的革命阶级。

早在奴隶制形成的夏王朝统治时期，奴隶们就提出了“予及汝偕亡”^②的革命口号，表示要与奴隶主贵族统治者血战到底。在殷、周王朝统治时期，奴隶们更以逃亡、起义、倒戈、暴动等斗争方式，不断地动摇着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统治地位；并提出“逝将去女，适彼乐土”^③的革命口号，表示要摆脱奴隶制的压迫与剥削，建立劳动人民理想的“乐土”。

面临如火如荼的奴隶起义，孔丘一方面惊呼：“好勇疾贫，乱也。”^④恨不得一下子把奴隶们的反抗镇压下去；一方

①《庄子·盗跖》。

②《尚书·汤誓》

③《诗经·硕鼠》

④《论语·季伯》

面又哀叹：“贫而无谄，难。”^①感到要消除奴隶们对奴隶制和奴隶主的仇恨并不那么容易。他“作言造语，妄称文武。”^②编造历史，美化西周统治者，为奴隶制唱赞歌，抛出“从周”、“复礼”的反动纲领，对抗奴隶们为建立理想“乐土”、反抗奴隶主统治的革命斗争。

针对孔丘美化奴隶制的谬论，柳下跖对奴隶社会的黑暗统治和奴隶主贵族的残暴罪行进行了愤怒控诉和深刻批判。他指出，在奴隶社会中，“以强凌弱，以众暴寡”^③，奴隶主贵族在政治上残酷地压迫（“凌”）劳动人民，在经济上残酷地剥削（“暴”）劳动人民。他从奴隶社会区别于原始社会的显著特征，揭露了奴隶主同奴隶之间的阶级对抗关系；进而揭露两个对抗的阶级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奴隶主阶级过着“不耕而食，不织而衣”^④的腐朽寄生生活，而广大劳动人民却只有“病瘦、死丧、忧患”的命运，没有“开口而笑”的权利^⑤，所谓“郁郁乎文哉”^⑥的奴隶社会，只不过是少数奴隶主贵族享乐的天堂，而对于广大奴隶则是人间地狱。他横眉冷对奴隶主贵族统治的黑暗现实，愤怒追溯奴隶社会的发展历史，大声宣告：“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⑦痛斥殷周以来的历代奴隶主贵族统治者都是欺压人民的坏蛋，奴隶们的死对头；奴隶们只有举起“金椎”，采取革命暴力，才能在砸烂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基础上，建立劳动人民理想的“乐土”。与奴隶主贵族们的“天堂”相反，在这个“乐土”里，消灭了“耕田的受

①《论语·宪问》

②《庄子·盗跖》

③《庄子·盗跖》

④、⑤、⑦《庄子·盗跖》

⑥《论语·八佾》

苦饿肚皮，读书的当官吃俸禄”^①的不合理现象，人人劳动，过着“耕而食，织而衣”的幸福生活，在这个“乐土”里，消灭了“使民战栗”^②的残酷统治，人人平等，过着“无有相害之心”^③的互助生活。柳下跖的革命理想，反映了劳动人民的革命要求，集中了广大奴隶的革命智慧。它不同于法家主张“不是礼义”^④、仅仅反对奴隶主贵族世袭等级特权的变革思想，而具有反压迫反剥削的革命内容，从而深刻地揭露了孔丘“克己复礼”纲领的反动实质。

蔑弃“鬼事”、不信“天命”的战斗无神论

恩格斯说：“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德国农民战争》）柳下跖为了消灭反动黑暗的奴隶制度，实现劳动人民的革命理想，勇敢地举起战斗无神论的旗帜，向“天命”、“鬼神”的宗教世界观进攻，撕破了披在奴隶制度身上的“神圣外衣”。

孔丘是天命论的狂热鼓吹者。他在天人关系问题上施放烟幕弹，首先抛出“天有意志”论，胡说宇宙间“唯天为大”，^⑤把虚构的“天”说成是主宰人间祸福和社会治乱的至上神；然后抛出“三畏”说，要人们“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⑥归根到底是要人们听任天命，放弃斗争，屈服在奴隶主贵族“大人”的统治权力下，永远当奴隶。针对孔丘反动天命论的

① “耕也，饿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

② 《论语·八佾》

③ 《庄子·盗跖》

④ 《荀子·非十二子》

⑤ 《论语·泰伯》

⑥ 《论语·季氏》

要害，柳下跖首先提出了“天与地无穷”^①的观点，认为天和地一样，只不过是无穷无尽的自然界。这就用自然之天否定了意志之天，把至高无上的天老爷打发到阴沟里去。然后提出“人死者有时”^②的观点，指出人不过是“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③的物质体。这就把孔丘神圣化了的“大人”还原为有生有死的“凡人”，把奴隶主贵族的神圣外衣剥得精光，“大人”就不必“畏”而可以“狎”了。柳下跖的天人观从理论上深刻地批判了孔丘的反动天命论，把奴隶们“不畏于天”^④的革命精神建立在朴素唯物论的基础上，起了解放思想的巨大作用。

祖先崇拜是天命论的反动核心。在以井田为基础，以宗法为纽带的殷周奴隶社会，“亲，民之结也。”^⑤血亲纽带是套在奴隶身上的锁链。只要抓住了这个锁链，就可以统治奴隶，维护奴隶主贵族按血缘关系规定的分封、世袭、等级统治地位。正是从这一政治需要出发，孔丘一伙狂热鼓吹“致孝乎鬼神”^⑥，“孝悌为仁之本”^⑦等宗教伦理信条，把祖先崇拜作为宣扬奴才哲学，防止“犯上作乱”的重要思想武器。针对这一阴谋，柳下跖向祖先崇拜的传统思想英勇挑战。他不仅在率领奴隶起义、争取胜利果实的斗争中，不讲宗族亲、不祭祖先神，^⑧坚决与旧的宗族观念决裂，把奴隶主贵族的宗法统治秩序砸得稀巴烂；而且对孔丘的侈谈“鬼事”、“妄作孝悌”从政治上加

①《庄子·盗跖》

②、③《庄子·盗跖》

④《诗经·小雅·无正》

⑤《国语·晋语》

⑥《论语·泰伯》

⑦《论语·学而》

⑧“贪得忘亲，不顾父母兄弟，不祭先祖。”《庄子·盗跖》

以深刻揭露，指出他宣扬祖先崇拜的目的，是妄图维护传统的血亲关系，让被打倒的奴隶主贵族沿着宗法等级的阶梯爬上“封侯富贵”^①的统治地位，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由于他揭露了祖先崇拜思想的反动实质，所以他在斗争中能够挫败孔丘利用宗族观念进行政治诱降、妄图使他“罢兵休卒，共祭先祖”^②的政治阴谋，把反对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武装斗争进行到底。

在柳下跖的武器批判和批判武器的扫荡下，“天命”、“鬼神”的宗教政治欺骗彻底破产，孔丘哀嚎：“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③

“非圣”、“薄古”的历史发展观

孔丘把天命论作为神化奴隶主贵族统治者的理论基础，宣扬“圣人”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要人们敬天法祖拜圣人，向反动权威投降。柳下跖高举“非圣薄古”的战斗旗帜，“备说非六王五伯”，^④向“圣人”、“大人”英勇挑战，表现了敢于造反的革命精神。

毛主席指出：“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孔丘就是这样，把奴隶们诬蔑为愚昧无知的“群氓”，“勇而无礼”的“小人”，而把奴隶主贵族的老祖宗却捧上了天。他开口“文武”，闭口“周公”，赞美他们是“尽善尽美”的典范，伟大得“荡荡乎”无

①、②《庄子·盗跖》

③《论语·季氏》

④《吕氏春秋·当务篇》

法形容，高大得“巍巍乎”无法攀登，人们只能在“圣人”脚下诚惶诚恐，顶礼膜拜。柳下跖拍案而起，横眉怒对那些被戴上“才士”、“忠臣”、“圣人”等等桂冠的“大人”们，把他们一个个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宣判他们是一些“饰行非世”^①、虚伪、反动透顶的伪君子；揭露他们满咀“仁义道德”，实际上却“利惑其真”^②，被功名利禄迷住了心窍；嘲笑他们为了沽名钓誉，可以绝食焚身、负石投河，甚至可以忍痛割下自己的腿肉来博取国君的欢心^③，他痛斥这些虚伪、愚蠢的丑恶表演“甚可羞”、“不足贵”、“为天下笑”^④；所谓“圣人”、“贤人”，不过是一些“磔犬流豕”——死在脏水沟里的猪狗，臭不可闻。^⑤柳下跖不信邪、不拜圣，把“上智下愚”的颠倒历史观重新颠倒了过来。

崇圣是为了复古。孔丘“修文武之道”^⑥，是为了复西周之古。他把文武周公统治的西周奴隶制美化为“郁郁乎文哉”的社会典范，发誓要“吾从周！”^⑦断言“百世”之后都要继承周制^⑧；狂叫敢有破坏“周公之典”者，“鸣鼓而攻之！”^⑨柳下跖以大量历史事实，驳斥孔丘的复古谬论。他指出人类从构木为巢到下地居住，从“不知衣服”到“织而衣”，从“拾橡栗”到“耕而食”，总是在斗争中前进；他指出：“神农”时代，人人平等，“无有相害之心”，到“黄帝”、“汤武”时代才产生“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现象，可见剥削制度也不是从来就有的；他指出：尧舜得天下，但子孙无立足之地；汤

①、②、③《庄子·盗跖》

④、⑤、⑥《庄子·盗跖》

⑦《论语·八佾》

⑧《论语·为政》

⑨《论语·先进》

武称天子，却后世绝灭，可见土地和政权不能是“永保”的^①。柳下跖纵论古今，畅谈历史，以社会运动的客观辩证法驳斥了孔丘复古倒退的反动历史观，为奴隶们推翻黑暗统治，建立理想“乐土”的革命斗争提供了理论基础。

柳下跖还以孔丘招摇撞骗、四处碰壁的反革命经历宣告“圣人”决定历史的唯心史观的彻底破产。他指出，孔丘自命“才士圣人”，吹嘘能“止暴禁非”，妄图把前进的历史车轮倒转过来；但是却“再逐于鲁，削迹于卫，穷于齐，围于陈蔡。”陷入革命人民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成了一条丧家之狗。凡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复辟派，都要落得个“不容身于天下”的可耻下场，而推动历史前进的奴隶起义，则要“横行天下”，任何力量都“禁”不了，“止”不住^②。这就是柳下跖对历史发展作出的革命结论。

为奴隶革命服务的道德学说

在阶级社会中，“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恩格斯，《反杜林论》）

孔丘为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提出了“克己复礼为仁”^③和“勇而无义为盗”^④的道德标准，把复辟奴隶制颂为最大的“善”——“仁”，把反抗奴隶制诬蔑为最大的“恶”——“盗”。他拿着这条道德标准，在起义英雄柳下跖

①《庄子·盗跖》

②《庄子·盗跖》

③《论语·颜渊》

④《论语·阳货》

面前大耍两面手腕，又是假惺惺地进行道德欺骗，又是恶狠狠地进行人身攻击，其险恶用心，不过是妄图用一套反动的宗法道德观念和功名利禄思想，诱使柳下跖放弃武装斗争，走“收养昆弟，共祭先祖”的投降道路，做一个合乎奴隶主贵族道德标准的所谓“圣人才士”^①。

柳下跖怒从心头起，火冒三丈高，对孔老二的恶毒攻击和他的反动道德观进行了彻底揭露和痛快淋漓的批判。

究竟谁是“盗”，究竟谁盗谁？奴隶们是盗，而奴隶主贵族被盗了吗？为了回击贵族君子们的恶毒攻击和无耻诬蔑，柳下跖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根据劳动人民的利益提出了划分道德善恶的标准。他指出：劳动人民“耕而食，织而衣”是“至德之隆”^②，是“最高的德”，剥削阶级“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是“罪大极重”^③，是“最大的罪”。根据这个标准，他撕下孔丘的道德伪装，揭露他“妄作孝悌”，“欲求富贵”，顽固坚持过剥削寄生生活的丑恶本质，戳穿他“多辞缪说”，为剥削制度和剥削罪行辩护的“巧伪”伎俩，宣判“盗莫大于子！”给这个剥削阶级的辩护士戴上了一顶“盗丘”的帽子^④，而对奴隶们反压迫反剥削的革命斗争则热情歌颂、高度赞美：“夺取奴隶主贵族霸占的财产，冲锋在前，这就是‘勇’；队伍转移，撤退在后，这就是‘义’；善于分析形势，灵活掌握战机，这就是‘智’；把斗争果实平均分配，这就是‘仁’。”^⑤一句话，镇压反动派，剥夺剥削者，是奴隶们的要求，是奴隶们的利益，奴隶们“诵义无穷”^⑥，把这种革命行动当作“最高的德”。

①《庄子·盗跖》

②、③、④《庄子·盗跖》

⑤“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时，智也；分均，仁也。”

《吕氏春秋·当务篇》

⑥《史记·游侠列传》

恩格斯指出：“一切所谓政治革命，从头一个起到末一个止，都是为了保护一种财产而实行的，都是通过没收（或者也叫做盗窃）另一种财产而进行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柳下跖正是为了夺取奴隶主贵族的不义之财，为争取奴隶翻身解放的利益，而提出了“剥削无理，造反有理”的革命道德观。

孔丘还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①的反动谬论，说什么奴隶主贵族是“重义轻利”的“君子”，而奴隶们是“见利忘义”的“小人”，“一遇困难，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②为了防止奴隶们起义造反，他们还抛出四条道德信条，要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③一切言论行动都不能越周礼范围。柳下跖首先揭露孔丘“重义轻利”的道德欺骗，指出他是口念“德”字经，心存“富贵”术的“巧伪人”，^④进而向反动礼教大胆宣战。他代表千千万万受压迫、受剥削、要翻身、要解放的奴隶们庄严宣告，饥寒交迫的奴隶生活再也不能忍受了，奴隶们就是“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⑤就是要睁开眼睛看世界，扬眉吐气干革命，摆脱贫困地位，建立一个劳动幸福的理想“乐土”。柳下跖的“四欲”论是奴隶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它反映奴隶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动员奴隶们砸乱宗教道德等等精神锁链，为奴隶阶级的翻身解放而无所畏惧地进行斗争。

同古代罗马奴隶起义领袖斯巴达克一样，柳下跖是“整个古代中最辉煌的人物”，具有“高尚的品格”，是“古代无产

①《论语·里仁》

②“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

③《论语·颜渊》

④《庄子·盗跖》

⑤《庄子·盗跖》

阶级的真正代表”。（《马克思致恩格斯（1861年2月27日）》）他不仅举起革命“金椎”，领导广大奴隶纵横扫荡，动摇了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而且拿起批判武器，狠批了孔丘“从周”、“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敬天法祖的宗教世界观，崇圣复古的历史退化论和虚伪反动的道德观，动摇了奴隶主贵族的政治思想统治。他所进行的武装斗争和思想斗争，推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为法家思想的胜利发展创立了条件。他在斗争中提出来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为我国劳动人民革命哲学史增添了宝贵财富。他在劳动人民中“名声若日月”，^①他的哲学思想永远放射出革命的光芒。

^①《荀子·不苟》

三、春秋战国时期劳动人民 反孔批儒的哲学战斗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动时期。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新兴地主阶级日益壮大，顺应历史潮流，生气勃勃地登上历史舞台，为夺取统治权而斗争。经过奴隶起义的扫荡，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井田制日益崩溃，政权正在瓦解，唯有思想文化阵地还保持着传统优势，他们凭借这一点进行垂死挣扎。这时，为争取解放而斗争的奴隶和自由的“百工”劳动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力军。在政治上，他们的斗争对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思想战线上，他们对维护奴隶主统治的孔孟之道予以坚决打击，特别对孔孟宣扬的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天命论和反动的政治思想，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在斗争中他们继承并发展殷周以来奴隶们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反对剥削压迫、争取平等权利的政治理想，对我国劳动人民革命哲学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反对“生而知之” 主张“身观”“亲知”的认识路线

奴隶主阶级复辟狂孔老二，自以为对西周文化“好古敏求”，^①最有权威；他的门徒也吹捧他“多艺”“多能”，是

^①《论语·述而》

“天纵之圣”，①开口闭口称他为“夫子”，为了抬高自己，愚弄人民，他还胡说什么“生而知之”者为“上智”，“困而不学”者为“下愚”，②狂热鼓吹智愚之分是天赋命定、永远不能改变的·唯心主义先验论。

知识和才能到底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学来的？在这个认识来源问题上，春秋末期的劳动人民同孔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和斗争。有一次，孔丘这匹“丧家之狗”东奔西窜，队伍被冲散，他的忠实门徒子路傲慢地问一位锄草的老农说：“你看见我们的‘老师’吗？”老农当场毫不客气地回击：“老师，老师！‘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算得个啥老师！”田夫野老的“二言八字”，击中了唯心主义先验论的要害，表达了劳动人民在知识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在劳动人民看来，知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只有四体勤劳的农民，才能在播种五谷的实践中获得生产知识。孔老二“四体不勤”，轻视劳动，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田，坐在书斋里吹嘘“博学多能”④，走到田野里却“五谷不分”。劳动人民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观点揭露了“夫子无知”的本来面目，指出“五谷分”，就叫做“有知”，“五谷不分”，就叫做“无知”。“知”来源于“勤”；“四体勤”，就“五谷分”，“四体不勤”，就“五谷不分”。因此滋养四体的五谷和生产五谷的科学知识，都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真正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不在圣人们的书斋里，而在劳动人民战天斗地的实践中。“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光辉词句，包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对“生

①《论语·子罕》

②《论语·季氏》

③《论语·阳货》

④《论语·子罕》

而知之”的谬论是十分有力的批判。

春秋时期的社会大变革，冲垮了奴隶社会的纲常名教。孔老二死抱着老一套不放，狂叫要“正名”，妄图用旧的“名分等级”原则（“名”）来扼杀革命的新生事物（“实”），把历史拉向后退。他和他的门徒们还把这种已经“崩坏”了的“旧名”绝对化为永世不变、可以决定一切的原则，认为“正”了“名”就可以倒转历史，恢复旧的统治秩序。这种“以名正实”的唯心主义先验论是为“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服务的。

到底是先有客观事物，后有关于事物的名称概念，还是相反呢？在所谓“名实”关系，即主观认识与客观事物的关系问题上，展开了一场大辩论。春秋战国时期的劳动人民，特别是从事“百工”劳动的手工业者的思想代表，①概括和总结了生产实践的丰富经验，提出了“以名举实”②的光辉命题，狠批了孔老二的唯心主义“正名论”。他们指出，那些脱离实际，徒有空名的儒家之徒，都是一些名不符实的空谈家。他们可以讲一大套造房子的空洞道理，却不能造出真正的房子来；只有造屋的工匠真正知道“所以为之若之何”③即如何造房子的实际技术，造出“冬避寒”、“夏避暑”的房屋来。这些先验论者的可笑，正如瞎子的乱猜一气一样，他可以闭起眼睛把什么叫“白”、什么叫“黑”谈得天花乱坠，但真正将黑白不同的东西混在一起，叫他挑开来，他就黑白不分了，甚至于黑白颠倒。因此，判断知识真假的标准，“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④不在口头上怎么说，而在实际运用中是否取舍不误。不仅要

①他们的思想资料保存在《墨子》一书中

②《墨子·小取》

③《墨子》中《公孟》和《耕柱子》

④《墨子·贵义》

“以名举实”强调主观认识要符合于客观实际，而且要“以实验名”，用实际效果来检验主观认识。这种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观点有力地驳斥了“以名正实”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他们还从自己的实际经验，总结了一条颠扑不破的认识论真理：“一目之视也，不若二目之视也，一耳之听也，不若二耳之听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强也。”^①指出世界上真正有知识的，不是那些自吹“生而知之”的“天才”，而是在各行各业中从事生产劳动，拥有实际经验的“百工”劳动者。这种唯物论的经验论，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和“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是一个有力的批判。

战国时期，孔家店的二掌柜孟轲进一步贩卖唯心论的先验论，鼓吹什么人的知识才能是先天固有的，人有“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②只要把这种“良知良能”加以扩充发挥，就成了“先知先觉”的万能者。这种人用不着接触实际，就能认识客观事物。当时“百工”劳动者的思想代表总结科学技术的丰硕成果，汇集劳动人民的哲学智慧，发展了“以名举实”的认识路线，提出了“摹略万物之然”^③的唯物主义反映论，给“良知论”以有力回击。

保留这类思想资料的《墨经》一书指出：知识不凭主观编造虚构，必须“以名举实”，用恰当的名词概念如实地反映客观实际。以绘图的画工为例，他要画虎，就必须把老虎作为摹写的对象，亲自动手，反复描绘，才能把老虎摹写得维妙维肖，形象逼真。主观是客观的摹本，决不能凭什么“良知良能”就能把事物的本来面貌如实地摹写出来。《墨经》还以劳动创造工具的生产实践，驳斥了所谓“不学而能”的胡说，指

①《墨子·尚同》

②《孟子·尽心上》

③《墨子·小取》

出“百工”们制造器皿就是以“身观”为基础，眼观手摸，与器材直接接触，反复考察外貌，开动脑筋思考，才能了解“万物之然”，从而作出器皿，获得有关知识。《墨经》从手工业者的实际生产过程中概括出人们的认识过程，指出人们的认识来源于“亲知”。在认识事物时，开始以“身观”为基础，只能对事物外貌有所察觉；①经过对事物外貌的思虑探求，②然后才能对事物有比较清楚和深刻的认识③。因此，知识不是什么“生而知之”、“不虑而知”的天才发现，而是劳动人民从自己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不断概括，总结出来的。战国时期的手工业劳动者，用这种朴素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有力地驳斥了孔孟的唯心主义先验论，把古代劳动人民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反对屈从“天命”，主张 发挥“人力”的劳动哲学

是战天斗地的劳动人民决定历史的发展，还是什么“唯天为大”的天命和“生而知之”的“圣人”决定历史的发展？围绕这个历史观的核心问题，春秋战国时期坚持“非命尚力”的劳动人民，同鼓吹唯心主义天命论和圣人史观的孔丘进行了激烈斗争。

孔老二继承西周奴隶主的天命论，妄称“天生德于予”，①胡说他奉着“天命”，来复兴周礼，挽救奴隶制的灭亡，妄图

①《墨子·经说上》：“知也者，以其知过（遇）物而能别之。”

②《墨子·经说上》：“虑也者，以其知有求也。”

③《墨子·经说上》：“智也者，以其知论物，而其知之也著。”

④《论语·述而》

使劳动人民“畏天命”、“畏大人”，不敢革命，顺从奴隶主的反动统治。当他驾起复辟的马车，颠颠簸簸来到一个渡口时，耕地的农民，坚持不信天命的朴素唯物论观点，在渡口摆开战场，大讲革命形势，用革命洪流不可阻挡的革命思想，批判了孔老二用以扼杀人民造反精神的天命论，狠狠地教训他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①意思是说：人民革命的洪流，滔滔天下，滚滚向前，定要冲垮“礼乐教化”的堤防，淹没“尊贵守业”的“大人”，荡涤奴隶主阶级的残渣余孽。这股革命的洪流，奔腾向前，迅猛异常，任何反动势力都不能改变它前进的方向。劳动人民以不可阻挡的洪水为喻，生动而深刻的阐明了革命的历史潮流不可逆转的真理。根据这个真理，劳动人民宣判：逆历史潮流而动，“知其不可而为之”^②，到头来决无好下场。

孔丘一伙四处奔走，摇唇鼓舌，大肆宣扬天命论，并用它来解释社会治乱。胡说：“命治则治，命乱则乱，”^③把社会治乱的根源，归结到“天命”。对这种“治乱在天”的反动唯心史观，劳动人民提出“治乱由人”的进步历史观，予以严厉批判。

当时，劳动人民的思想代表向鼓吹天命论的孔丘门徒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④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难道老天爷在桀纣时睡大觉，到汤武时才睁眼管事吗？这个难题，把天命论者问得哑口无言，而劳动人民的思想代表对此却作了明确的回答。他们说：“存乎桀纣而天下乱，存乎汤武而天下治”。^⑤社会的混乱完全是统治者造成

①《论语·微子》

②《论语·宪问》

③《墨子·非命上》

④、⑤《墨子·非命下》

的，根本就不是由于什么“天命”。反动统治者妄图用天命论来一方面神化自己的反动统治地位，一方面开脱自己造成社会混乱的罪责，这万万办不到。

孔丘之徒大肆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①的宿命论，力图使劳动人民相信，剥削阶级享尽富贵荣华，是命当如此，劳苦大众挨饿受冻是命里注定，其反动目的在于要人民“安贫乐道”“听天由命”，俯首帖耳地接受奴隶主的统治，不起来进行革命斗争。为了抨击这套“听天由命”的无耻谰言，战国时期手工业劳动者的思想代表提出“非命尚力”的革命哲学。

他们指出：“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②不是什么皇天上帝的命令决定人们的命运，而是劳动人民的强力生产，决定人类的生存。无数历史事实说明：古代劳动人民从来就是依靠自己强劲的双手，与天斗，与地斗，与虫蛇野兽斗，在征服自然的斗争中，创造了日益丰富的物质，发展壮大了自己。如果都象剥削者那样，“四体不勤”，“不稼不穡”，不但不会有繁荣发展的科学文化，连人类也早就灭绝了。他们回顾历史，指出：“古者羿作弓，羿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舟”^③，每一项技术发明，都是劳动人民血汗的结晶，决不是什么上帝或圣人的恩赐，没有劳动人民的大胆革新创造，剥削阶级哪有弓甲可用，舟车可使？反动统治者剥夺了劳动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过着骄奢淫逸的寄生生活，却反而大骂从事“耕稼树艺”的农民是“鸟兽”，攻击手工业者的发明创造为“奇技淫巧”，真是反动透顶。

春秋战国时期的农民和“百工”劳动者，就是这样纵谈天下

①《论语·颜渊》

②《墨子·非命上》

③《墨子·非儒下》

革命形势，回顾人类生产发展的历史，歌颂人力，狠批“天命”，粉碎“畏天知命”的精神枷锁，树立“非命尚力”的革命思想，在我国劳动人民革命哲学发展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

反对“厉民自养”，主张 “君民并耕”的政治思想

战国时期，奴隶起义风起云涌，变法运动蓬勃开展，奴隶主阶级的井田制和世袭等级制进一步动摇崩溃。孟轲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法权，大肆宣扬“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①的“剥削有理”论。要滕国奴隶主头子站出来大刀阔斧“正经界”、复井田，死死保住奴隶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当他这套反动谬论受到劳动人民的批判后，他还搬出奴隶主阶级的社会分工论来进行诡辩，说什么，既然“或劳心，或劳力”是社会分工的结果，那末，“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于人，治于人者食人”，就是“天下之通义”了，^②就是说，奴隶主阶级应该剥削压迫奴隶，奴隶们应该受剥削受压迫。这种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关系和等级秩序，是永世不变的“天经地义”。孟轲鼓吹的这套奴隶主阶级的法权，是典型的“压迫有理”论和“剥削有理”论。

反映农民利益和要求的农家学派代表许行，举起批判旗帜，狠批了孟轲这套反动谬论。他借“神农之言”来“非先王之道”，宣扬农民革命要求，提倡“君民并耕而食”^③的社会平等学说。当时，许行所信奉的“神农之言”，代表小生产者的思想，十分强调小农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指出“士有

①《孟子·滕文公上》

②、③《孟子·滕文公上》

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织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① 强调人们吃的粮食、穿的衣服，样样都是劳动人民用血汗创造出来的，没有“劳力者”创造的这些物质财富，“劳心者”早就饿死冻死了，那里还谈得上“治人”呢？许行同孟轲宣扬的“通义”针锋相对，提出了劳动人民的“通义”，他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② 当官的要脱鞋下田，与大伙同滚一身泥，同吃一锅饭，这才是受人民尊敬的“贤者”；那些一不会种田，二不会做工的贵族老爷们，是可耻的寄生虫。“君民并耕”论，反映了早期封建社会农民群众反压迫、反剥削、向往平等生活的社会理想，是对“劳心者治人”的奴隶主阶级法权思想的有力批判。

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为了同没落奴隶主阶级争夺土地和劳力，实行了“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③ 的经济政策，给解放了的奴隶一小块土地，免除他们三世的赋役。这个政策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奴隶主阶级的卫道士孟轲，跳出来同新兴地主阶级较量，他跑到滕国去鼓吹奴隶主阶级的“仁政”，欺骗人民说，要“为民制恒产”，^④ 实际上是代表逸民——破产奴隶主的利益，来“正经界”、“复井田”，搞反攻倒算。起初孟轲鼓吹的“仁政”，暂时地蒙蔽了一些人，宋国的陈相和他的弟弟陈辛，也背着农具赶到滕国去了。他们很快就发现受了骗，同许行一起，以自己的切身体会，戳穿“仁政”的谎言。

他们说：我们来到滕国，以为真有什么对劳动人民有利的

①《吕氏春秋·爱类篇》

②《孟子·滕文公上》

③《商君书·徕民》

④《孟子·梁惠王上》

“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①，在滕国住下来，当个自食其力的农民。现在看透了，原来天下乌鸦一般黑，你们这里同样是“仓廩府库”中的粮食、布帛堆积如山。什么！“为~~民~~制~~恒~~恒产”，完全是“厉民以自养”^②，用劳动人民的血汗来喂养你们这批寄生虫、吸血鬼。农家学派用“君民并耕”的政治思想揭露了剥削阶级“厉民以自养”的社会现实，大大擦亮了劳动人民的眼睛，去识破奴隶主阶级复辟派的伪善面孔。

战国时期，随着井田制的破坏，大批没落奴隶主贵族转为商人或高利贷者。他们囤积居奇，操纵市价，在市场上剥削农民和手工业者。孟轲也百般地为他们的剥削行为辩护。许行代表小生产者的利益，提出“市价不二，国中无伪”^③的主张，打击那些“贩贱卖贵”的投机商。他主张划一商品价格，“布帛长短同，则价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价相若；五谷多寡同，则价相若；履大小同，则价相若。”^④即同类商品，只要长短、轻重、多寡、大小相同，价格就应该差不多，以防止奸商高抬市价，从中牟利。要做到“虽使五尺之童子适市，莫之或欺”。^⑤这是劳动人民的又一美好理想，即希望有一个合理的市场来交易商品，做到有无相通而无欺诈，经济互利而无剥削。这个希望虽然当时同样不能实现，却揭露了工商业奴隶主的剥削罪行。孟轲理屈词穷，只好搞诡辩，对许行“市价不二”的主张，首先加以歪曲，然后进行攻击，说什么许行主张鞋子不分质量，不分大小，统统一个价。这就充分暴露他为奴隶主阶级的剥削欺诈行为进行狡辩的反动本性。

春秋战国时期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是在反抗奴隶主阶级反动统治的斗争中解放出来的劳动人民。他们在奴隶制向封建制

①、②《孟子·滕文公上》

③、④、⑤《孟子·滕文公上》

转变时期，不仅战天斗地，劈山治水，推动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批孔反儒，活跃于百家争鸣的思想战线，成为反复辟斗争中的一支生力军。他们从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朴素唯物论和平等政治观，对孔孟宣扬的“生而知之”的先验论，“畏天知命”的天命论，“正名、复礼”的反动法权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为法家学派反对儒家学派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扫清了思想障碍，提供了理论思想源泉，对以后农民革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五谷可分”到“世事可知”，从“非命尚力”到“冲天”、“闻天”，从“君民并耕”到“除暴均田”，可以看出劳动人民革命思想在斗争中的继承与发展。这一时期农民和手工业者的革命哲学在我国劳动人民革命哲学发展史上，发挥了承先启后的历史作用。

四、秦末农民革命领袖陈胜、 吴广“王侯无种”的反天命思想

公元前二〇九年，我国历史上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第一次农民大起义。这次起义，不仅粉碎了赵高、胡亥为代表的奴隶主复辟逆流，推翻了第一代封建王朝，在社会发展史上谱写了第一篇农民革命的战斗诗章；而且还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对儒家的唯心主义天命论及其反动思想路线实行了猛烈的批判，在哲学史上也树立了农民革命哲学的第一面光辉旗帜。

春秋战国以来，前赴后继的奴隶起义，宣告了奴隶制的灭亡。战国末期，新兴地主阶级的杰出政治家秦始皇，顺应历史潮流，坚持法家路线，结束了世袭分封的诸侯割据局面，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一政权，标志着我国历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秦王朝作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政权，它必然要对农民实行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同农民阶级存在着矛盾。但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和广大人民同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更为突出。尽管秦始皇采取了“焚书坑儒”等坚决措施，但不甘心灭亡的奴隶主贵族总还是把他们的复辟希望变为复辟行动。孔老二的八代孙孔鲋就对抗秦始皇的焚书令，把儒家的《诗》、《书》等暗藏夹壁，伺机反扑；被秦政权通缉的魏国贵族张耳、陈余等，更改名换姓，潜伏下来，窥伺方向，以求一逞。这些奴隶主贵族人还在、心不死，他们阴谋复辟的反革命活动，在他们隐藏在秦政权内部的政治代表赵高身上集中的

表现出来。秦始皇死后，法家代表李斯等满足于“富贵极矣”的现状，赵高却乘机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反革命政变，篡夺了秦王朝的统治权。他一反秦始皇的法家路线，推行了一条“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①的复辟路线，向新兴地主阶级革命派实行疯狂的反攻倒算，“尽除先帝之故臣”，法家代表遭到了血腥镇压。与此同时，还大大加重了对农民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赋税越来越重，兵役没完没了”。^②对于人们的反抗更是血腥镇压，致使“刑者相伴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③把秦始皇时代的“黔首大安”的政治局面一变而为“黔首震恐”的恐怖局面。奴隶主贵族的篡权复辟，迅速激化了秦王朝与广大农民的阶级矛盾。正当奴隶主贵族的复辟阴谋得逞，而新兴地主阶级无力反击，广大农民面临着重作奴隶的危险关头，我国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烈火终于由陈胜吴广点燃了。

“氓隶之人”“宜为王”的夺权思想

陈胜，又叫陈涉，阳城（今河南登封县）人；吴广，又叫吴叔，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他们都出身贫雇农。陈胜少年时，就给地主当雇工，被人称为“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④即住破草棚的农奴。深受剥削压迫的阶级地位，使他们早就产生了革命造反的思想。一次，陈胜在“与人佣耕”^⑤时，就向雇工伙伴们倾吐了自己蔑视天命、向往革命的“鸿鹄之志”，他说：“以后谁要是翻了身，可不要忘记一起干过活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赋敛愈重，戍徭无已。”——《史记·李斯列传》。

③同②。

④贾谊《新书·过秦论》。

⑤《史记·陈涉世家》。

的穷伙计。”陈胜这种“苟富贵、无相忘”的“鸿鹄之志”^①，表达了千百万农民要求改变社会地位的强烈愿望和冲决一切网罗，掌握自己命运的革命信念。

公元前二〇九年七月（秦二世元年），陈胜吴广等九百名贫苦农民被征调去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服兵役。他们被押送到大泽乡（今安徽省宿县）时，就被大雨困阻，延误了报到期限。按当时的法律，误期就要杀头。在逃亡、等死，还是奋起反抗的选择关头，陈胜吴广以革命农民的坚定立场，毅然发动了起义。他们杀死了押送的军官，向大伙进行革命动员说，

“咱们逃跑是死，起来造反最多不过也是死，同样是死，为穷苦人民打天下而死，不是更好吗？”^②又说：“咱们穷人硬骨头不死便罢，死也要干一翻轰轰烈烈的大事业！”^③陈胜、吴广仗义而起的革命行动，得到了被征调农民的热烈响应，他们都表示愿意听从陈胜的指挥。“奴隶们一旦意识到自己的可耻的奴隶地位，这种仇恨就会引导他们去建立最伟大的历史功勋。”（列宁：《世界政治中的引火物》），陈胜、吴广的革命动员，表明他们在斗争中意识到了“不是战斗，就是死亡”的革命真理，认识到只有同反动统治者作殊死的斗争，才能够打出人民的天下。他们高举“大楚兴、陈胜王”^④的旗帜，号召“举大计”，“死国”，以革命造反精神鼓舞起义壮士，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为建立农民革命政权而英勇奋战。他们所说的“死国”，就是誓死推翻反动统治，建立农民革命政权，充分表现了革命农民的大无畏的造反精神。

①《史记·陈涉世家》

②“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史记·陈涉世家》

③“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同上。

④《史记·陈涉世家》。

在陈胜吴广领导下，起义军执行了“伐无道、诛暴秦”^①的革命路线，把斗争矛头直指奴隶主贵族的复辟势力。他们要伐的“无道”，就是奴隶主的复辟阴谋；他们要诛的“暴秦”，就是以赵高、胡亥为代表的复辟政权。在这条路线的指引下，起义军攻城池、杀郡守、劫县令，所向披靡。各地农民、奴隶纷起响应，起义军迅速发展到几万人。在革命风暴迅猛兴起的时候，一些没落的六国贵族也打起“反秦”的旗号，抱着复辟的希望，混进了革命队伍。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不可避免地起义军内部激烈地展开了。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转引自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求建立农民革命政权，而在建立什么性质的政权这个根本问题上，陈胜、吴广同以张耳、陈余为代表的奴隶主复辟势力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起义军攻下陈县以后，广大将士认为陈胜能为劳动人民打天下，也能为劳动人民坐天下，一致赞颂陈胜“功宜为王”。^②与此相反，混进起义军中的复辟势力的代表张耳、陈余等却极力反对。他们死抱着“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的反动说教不放，认为奴隶主贵族才是理所当然的统治者，而种田人只是天生的被统治者，

“氓隶之人”那有资格称王？他们一面诱骗，劝陈胜自己不必称王，赶快带兵西进，要首先“立六国后”，即把六国旧贵族的后代封为诸侯，好为自己拉朋友，这样用所谓“德治”服天下，就可以成就什么“帝业”。^③一面又进行威胁，说什么“如果陈胜自立为王，天下的人心就会瓦解。”^④其目的就是反对“氓隶之人”为王，

①《史记·陈涉世家》

②《史记·陈涉世家》

③“愿将军毋王，急引兵西进，遣人立六国后，自为树党。以德服之，如此则帝业成矣。”——《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④“今独王陈，恐天下解也。”同上。

而要让奴隶主贵族东山再起、割地称王。起义军看破了这伙复辟派的狼子野心，对于他们的诱骗威胁给予了坚决抵制，陈胜代表了广大农民的革命觉悟，毅然决定建立“张楚”农民革命政权，在我国历史上劳动人民第一次掌握了印把子。

“张楚”农民革命政权，是在同赵高、胡亥的复辟政权进行生死搏斗中和同混入起义军内部的复辟势力展开尖锐斗争中诞生的。它的诞生，是中国农民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尽管这个农民的红色政权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不长，然而，它光耀史册，^①对以后的农民革命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张楚”政权的建立，表明了我国第一次农民大革命，就把夺取政权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觉醒了的劳动人民，既反复辟，又反皇权；不仅要打翻剥削阶级的反革命政权，并且要实行劳动人民的革命专政。“氓隶之人”“宜为王”的革命哲学，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儒家反动历史观是根本否定，它的批判锋芒使秦汉之际的法家思想家的任何进步主张都相形见绌。

否定天命神权和世袭特权的“王侯无种”论

“氓隶之人”“宜为王”的革命理想，是建立在“王侯无种”反天命的思想基础之上的。要创建农民革命政权，首先必须砸碎反动的天命论这副枷锁。陈胜、吴广提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②的思想纲领，从哲学上批判了奴隶主贵族所宣扬的维护世袭等级特权的反动血统论，有力地打占了孔孟儒家拼命鼓吹的神学天命论。

①长沙马王堆二号汉墓出土文物帛书中的天文书《五星占》在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后，即只记“张楚”年号，而不标秦二世年号（参看《文物》1975年第5期）

②《史记·陈涉世家》

长期以来，奴隶主贵族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竭力宣扬“君权神授”、“富贵在天”的唯心主义天命论，他们捏造出一个主宰一切的“上帝”，并自称是受上帝之命来统治人民。他们胡诌什么富贵与贫贱、统治与被统治的社会关系全是天意的安排，永远不能改变，如果劳动人民要起来造反，“犯上作乱”，就会“获罪于天”，受到天的惩罚。奴隶主是天生的贵种，应享有统治人民的世袭特权；而劳动人民是天生的贱种，世世代代都只能做奴仆。这种以天命论为基础的“君权神授”、“贵贱有种”论，正是孔孟之徒用来维护世袭等级特权的全部反动哲学的核心。

针对孔孟之道的核心，陈胜、吴广响亮地提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革命口号，用“王侯无种”的反天命思想作为革命造反的理论基础，指导和鼓舞着起义农民为夺取政权而英勇奋斗。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思想纲领明确宣告：统治人民的帝王将相并不是天生的，社会上的富贵、贫贱也不是老天爷安排的，根本没有什么主宰一切的“上帝”，统治与被统治的地位完全可以通过斗争加以改变。劳动人民可以踢倒帝王将相，建立自己的政权，做社会的主人。这种“王侯无种”的反天命思想，是对“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宿命论的有力批判，是对“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的血统论的彻底否定，也是对“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世袭等级制的致命打击。它表现了劳动人民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摆脱了“安贫乐道”、“劳而无怨”的奴化思想的束缚，冲破了统治阶级的精神禁锢，要革命、要造反、要为王。正如列宁指出的：“**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革命家。**”（《纪念葛伊甸伯爵》）一切剥削阶级都企图用“贵贱有种”论来维护少数特权者对广

大群众的专政；与之相反，只有被剥削群众才能坚持“贵贱无种”论，以反对剥削者的统治特权。这里，表现出两个阶级、两条思想路线的根本对立。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思想家也曾反对过“君权神授”的天命论，主张“制天命而用之”，然而他们仍然强调“君子”和“小人”的界限，主张“贵贱有等”，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贵贱有种”，因而也不可能彻底抛弃神权。只有劳动人民才能坚持贵贱“无种”，从而根本否定天命神权的谎言。

在“贵贱无种”的反天命思想指引下，陈胜、吴广领导的起义军越战越强，秦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陈胜吴广决定派大将周文领兵直捣秦都咸阳，打翻赵高、胡亥的反动政权。这时混入起义军队伍的孔老二的八代孙孔鲋又摆出天命论来，妄图阻止农民军前进。孔鲋叫嚷：“秦王朝虽然被天所抛弃，但前途究竟如何，仍然要由天命决定。”^①要陈胜停止进军，并威胁说：“现在大王用兵而不注意修德来顺从天意，一旦失败，后悔都来不及了。”^②陈胜看穿了他玩弄天命论来恐吓农民军的阴谋诡计，当即予以彻底揭露，痛斥孔鲋说：“我们起义军的事，与你无关，用不着你胡言乱语。”^③并指出：“你所讲的天命论那一套，故弄玄虚，我们不懂！你还是靠边站吧！”^④孔鲋鼓吹“祸福凶吉、大者在天”，实际是继续孔老二的“畏天命”，妄图用“天人相通”的唯心主义天命论来迷惑农民军。陈胜痛斥孔鲋说，收起你那套天命、神权，还是讲“人间近事”^⑤吧！这是继柳下跖之后，劳动人民对孔老二胡诌的“天

① “夫虽天所舍，祸福凶吉，大者在天”——《孔丛子·答问》。

② “今王不修人利以应天祥，若跌而不振，悔之不及也。”——《孔丛子·答问》

③ “寡人之军，先生无累也，请先生息虑也。”——同上。

④ “先生所言，计策深妙，子不识也。先生休矣。”——同上。

⑤ 《孔丛子·答问》。

命”、“鬼事”的又一次尖锐抨击，充分表现了革命农民“天人相分”的朴素唯物主义的战斗精神。

坚持“吾自举”、反对“法先王” 的革命历史观

“张楚”政权建立后，究竟执行什么政治路线，是复旧倒退还是革命前进？是“法先王”；还是走自己的路？在这个原则问题上，陈胜等同反动儒生继续展开斗争。

孔鲋顽固坚持复辟路线，“张楚”政权刚建立，他就趁机叫嚷：“以前周朝代替殷朝，把‘兴灭继绝’的施政方针放在首位。现在建立政权，必须效法先王，把六国旧贵族扶植起来是头等大事。”^①陈胜坚持农民阶级反复辟、反倒退、反对“法先王”的立场，对孔鲋的“进言”予以迎头痛击，义正词严地指出：“六国的后代我不能封！以前的帝王，与我有何关系？我们自己举行起义，跟周朝毫不相干，又怎么能按他们的办法去做呢？”^②断然拒绝了分封六国后代的主张，批判了“法先王”的反动路线，并鲜明地提出了“吾自举”的革命方针。“法先王”，就是复辟奴隶制度，使农民重新沦为奴隶；“吾自举”，就是农民革命造反，有自己的路线，自己的纲领，走自己的路，建立自己的政权。“吾自举”与“法先王”，是农民革命路线同奴隶主复辟倒退路线的对立，也是劳动人民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革命历史观同只有贵族、圣人才能统治人民的反动历史观

① “昔周代殷，乃兴灭继绝，以为政首。今诚法之，则六国定，不携，抑久长之本。”——《孔丛子·答问》。

② “六国之君，吾不能封也！远世之王，于我何有？吾自举，不及于周，又安能纯法之乎？”——《孔丛子·答问》

的对立。“吾自举”的口号，表现了革命人民对“法先王”思想的极大轻蔑，充分显示了劳动人民冲破了天命论的束缚后焕发出来的革命首创精神。“法先王”的思想，也曾受到法家人物的批判，他们提出过与之相反的“法后王”的进步主张。由于阶级的局限，他们的主张，不过是为了改换或完善剥削阶级统治人民的国家机器。只有劳动人民才能坚持“吾自举”的革命路线，劳动人民的翻身解放，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的革命斗争。

陈胜还进一步揭露了鼓吹“法先王”的儒家的反动本质，指出“儒者，可与守成、难于进取。”^①所谓“守成”，就是向后看，搞复辟，维护旧制度；“进取”，就是向前看，干革命，开创新事业。“守成”与“进取”，是两条思想路线和两种历史观的根本对立。反动儒生们是没落奴隶主的代言人，总想开历史的倒车，最好回到“先王”时代去，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陈胜以自己的批判武器和革命行动，充分揭露了儒家“法先王”的反动目的，表现了坚持“吾自举”的革命农民反孔斗争的自觉性。

陈胜、吴广领导的秦末农民大起义，在奴隶主复辟势力的分裂破坏和残酷镇压下失败了。但他们“奋臂为天下创首”的革命精神，为我国农民革命史开创了“揭竿而起”的光荣传统。它不仅打击了复辟逆流，推翻了赵高、胡亥的复辟政权，为汉初重建封建政权扫清道路，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且在思想战线上，以劳动人民自己的批判武器，对孔孟的反动唯心主义哲学进行了革命的扫荡，为我国农民革命哲学的创立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从思想和行动上都为以后的农民革命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①《孔丛子·答问》

五、汉末黄巾军破“苍天”、 立“黄天”的革命辩证法

西汉后期，巩固了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开始走向反动，由尊法反儒转到了尊儒反法。由于儒家路线的统治，造成政治日趋黑暗。到了东汉，世家豪族大地主势力得到恶性发展，他们依仗政治特权大搞土地兼并，“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①迫使大批自耕农破产，沦为依附农民，“父子低首，奴事富人”，受着残酷的剥削和奴役，“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②。东汉末年，豪强割据，战祸连年，劳动人民更加痛苦，阶级矛盾日趋激化。

为了防止农民的反抗，东汉统治者加紧对人民的思想奴役，把西汉大儒董仲舒一整套反动的神学目的论定为官方哲学，鼓吹“奉天法古”，把封建宗法等级制说成是天意安排，把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条极大的绳索强加在农民身上，用以维护豪族大地主的黑暗统治。

残酷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思想奴役，激起广大农民的愤怒反抗。东汉末七、八十年间爆发了六、七十次农民起义，革命烈火越烧越旺。公元一八四年，由张角领导的有几十万农民参加的黄巾大起义爆发了。

张角，河北巨鹿（今平乡县）人，他是一个很有群众威望、很有组织才能的农民领袖。他总结了以往农民起义的经验和教

①仲长统：《昌言·理乱篇》

②崔实：《政论》

训，认为要推翻反动统治，不仅要有强大的革命武装，而且要有严密的组织和造反的思想武器。他以巨大的毅力，为起义进行了长期的宣传组织工作。他自称“大贤良师”，以传教为名，用治病为手段，在山东、河南、河北一带联络了几十万贫苦农民。张角把他们分成三十六方，大方一万人，小方六、七千人，每一方由一个首领率领，便于统一指挥。^①甲子年（公元一八四年）二月，张角一声令下，三十六方农民军同时起义。头裹黄巾为标记的几十万起义大军，高喊“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战斗口号，向腐朽的东汉王朝发动了猛烈进攻。“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各地贫苦农民纷纷加入起义军。“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②起义的风暴席卷了半个中国，东汉王朝在农民起义的革命怒火中复灭。

张角在发动和组织黄巾起义的长期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的“太平”理想和革命哲学。

反压迫、反剥削的“太平”理想

黄巾起义是经过长时间做意识形态方面工作后发动的一次农民革命战争，在革命的觉悟性和组织性方面都比它以前的多次农民起义有显著进步，张角利用和发挥了当时民间流行的《太平经》中蒙上了宗教外衣的农民革命思想，制定了起义的政治、经济纲领，就是要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一个政治平等、财产公有的“黄天太平”的理想社会。

首先，政治上要求“平等”，反对封建农奴制的极端不平等。在张角等利用来作为政治鼓动的《太平经》中，曾用宗教

^①《后汉书·皇甫嵩传》

^②《后汉书·皇甫嵩传》

语言表达这种政治理想，即认为：人类社会的生活，要象天地养育万物那样公平无私。^①实现“平等”的原则，反对统治阶级的“奸私”，反对封建等级制度。东汉时期，在豪门氏族的特权统治下，大批破产农民，沦为依附农和奴婢，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黄巾军提出的“太平”口号，就是号召受苦受难的人民起来战斗，反对豪族大地主的特权统治，反对封建依附关系。根据“平等”原则，建立一个“凡事悉治，无复不平”^②的“太平”世界。

其次，在经济上要求财产公有，人人“各衣食其力”。黄巾军领袖被称为“天公”“地公”“人公”将军，他们这样把一个“公”字“简明地以政治标语的形式写在旗帜上”（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表达了广大农民反对剥削制度、要求财产公有的强烈愿望。由于世家豪族的土地兼并，形成了“强者霸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③的极端贫富不均现象。黄巾军认为：天下的财物是用来养活天下人的。皇帝府库的钱财，本来也不归他个人享用。这些劳动人民创造的财物，只能“共取”，不能“独有”^④。从这种财产“共有”的思想出发，他们对儒家“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反动说教，进行尖锐的批判，认为：既然自然赋于人人都具有劳动能力，就应该人人都靠自己劳动来生活。但是剥削成性的贵族地主们将“天地中和之财”，大量金银财宝据为己有，并且“封藏于

①《太平经钞癸部》：“太者，大也，大者，天也；天能覆量万物，其功最大。平者，施也，地平然能养育万物。”

②《太平经》卷48

③《后汉书·皇甫嵩传》

④《后汉书·王莽传》

⑤《太平经》卷67：“此财物乃天地之中和所有，以共养人，本事生以给一人也；其有不足者，悉当从其取也。”

幽室，令皆腐涂。”穷苦人民去求他们，他们竟然一毛不拔，即使贷出一点也是高利盘剥，逼得广大穷苦农民“饥寒而死”。^①黄巾军痛斥这些贪得无厌的剥削者是“仓中之鼠”，他们“与天为怨，与地为咎，与人为大仇”，是“天地间大不仁人”，“其罪不除”^②！这是起义农民对剥削有理的愤怒批判。

为了建立一“平”二“公”的“太平”世界，黄巾军所到之处“焚烧官府”、镇压儒生、摧毁豪强地主的政权、族权，解放了大批被奴役的依附农民和奴婢。同时在起义军内部，他们冲破儒家一套封建纲常的等级制度不称君，不设官，广大战士对各级首领，直呼外号^③，关系融洽。和黄巾军同信一个教，同走一条道的汉中地区的“五斗米道”，在汉中建立农民政权后，也不设置官吏，由部众首领（称“祭酒”）来治理人民，官兵平等，废除封建的严刑酷法，即使是犯了法的人，也“三原而后刑”，以说服教育为主。^④这些措施，代表着起义农民所建立起的革命新秩序，对等级森严的封建法权是根本否定，从理论和实践上沉重打击了董仲舒泡制的一套反动纲常。

在经济上，黄巾军和“五斗米道”的起义农民，根据财产公有，人人“各衣食其力”的原则，每打到一处，围攻豪强地主的庄园，杀掉这些“仓中之鼠”，没收他们强占的不义之财，分给当地受苦的农民。“五斗米道”在汉中建立政权后，在大路上设置“义舍”，准备了“义米”、“义肉”，凡路过的贫苦人民，“量腹取足”，住宿不收费、吃饭不要钱，深受广大

①《太平经》卷67

②《太平经》卷67

③《后汉书·皇甫嵩传》：“其大声者算雷公，骑白马者为张白骑，大眼者为大目……如此称号，各有所因。”

④《三国志·张鲁传》：“犯法者，三原而后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

群众欢迎。^①这种对财产的“公”字观，反映了前期封建社会中处于赤贫地位的广大农奴的迫切要求和崇高理想。

黄巾军提出的一“平”二“公”理想，是反对封建农奴制的革命理想，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然而它鼓舞着千百万农民奋起斗争，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反天命、反神权的“贵贱由人”论

东汉时期，由汉章帝亲自出马主持的白虎观神学讨论会，编定了《白虎通义》，把董仲舒一套“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加以条理化，封建统治者用这种极端荒诞的谶纬神学来加强对广大农民的思想奴役，鼓吹人间的一切尊卑贵贱等级秩序，都是由“天”决定的。把“天”说成有意志的人格神，主宰着自然界的万物兴衰和人类社会中的祸福 寿夭贫富贵贱等等，这样极力抬高“天”的权威，目的在用神权来强化皇权，镇压人民的反抗^②。黄巾起义军针对董仲舒之流“屈民而伸天”的反动说教，提出了反对天命，否定神权的“贵贱由人”论。

张角在发动起义时所利用的《太平经》中，曾以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指出：“夫天地之为法，万物兴衰，反随人故。”^③就是说自然界的万物，农作物生长的好坏，是与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紧密联系着的，“耕用力”，自然界就“报以厚”，^④努力耕种，就能获得丰收。这是天人关系的因果法则。至于人们

①《三国志·张鲁传》：“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事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民夷便乐之。”

②《白虎通义》：“天之为言镇也，居高理下，为人镇也”。

③《太平经》卷65

④《太平经抄》丙十五：“比若人种刈，种善得善，种恶得恶，耕用力，分别报之厚。”

的贵贱地位，如同事物的兴衰一样，是由人决定的。^①这种“贵贱由人”的思想，是秦末农民“王侯无种”反天命思想的继续和发展。表明革命农民在斗争中摆脱了天命论的束缚，意识到在生产活动中，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可以改造自然，夺取丰收，在社会生活中，被压迫阶级依靠自己起来斗争，也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对于董仲舒之流关于天命神权的反动说教是直接的否定，对广大农民奋起斗争，识破孔孟儒家编造的“富贵在天”之类的谎言，起到了解放思想的巨大作用。

董仲舒之流，为了“屈民”，还泡制了“性三品”的反动说教，恶毒污蔑劳动人民只具有“斗筭之性”，全是愚昧无知的“小人”，只能接受地主官僚的统治。黄巾军在“贵贱由人”的哲学思想指导下，在三十六方同时奋起的战斗实践中，逐步认识到了人民自己的伟大力量。他们踢翻封建神权，藐视封建政权及其作威作福的大小官吏。在起义军中，流行着这样一首歌谣：“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②这是一首气壮山河的革命战歌。它表现了革命农民决心前赴后继，战斗到底的革命精神，宣布人民革命力量是吓不倒，杀不尽，不可战胜的。孔老二的“上智下愚”，“小人易使”的反动唯心史观以及董仲舒之流“屈民”“尊天”的神学呓语，统统见鬼去吧！世界上最有权威，最有力量的，不是天、不是神、不是皇帝、不是地主官僚，而是在“一唱雄鸡天下白”中觉醒了的千百万劳动人民。反动派没有什么可怕，人民革命力量才是不可战胜的。

这种不畏强暴，相信人民的革命史观，武装了广大起义农民，从公元一八四年张角发动起义，经黑山、白波等起义军前

①《太平经》卷85：“凡人兴衰，乃万物兴衰，贵贱由人。”

②《金后汉文》卷48

赴后继，直到公元二一五年“五斗米道”在汉中建立的政权失败，坚持斗争共三十年，给东汉王朝以毁灭性打击。

黄巾起义军以“小民不可轻”的大无畏精神，横扫孔孟之道，所到之处，捣孔庙，烧儒书，坚决镇压豪门氏族、贪官污吏，反动儒生。把当时称为“颜渊第二”的荀彧，孔丘二十代孙孔融等儒家代表人物，杀得一个个落荒而逃。经过黄巾起义军的革命大扫荡，西汉时期董仲舒精心泡制的神学目的论，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而黄巾军“贵贱由人”的反天命思想却在哲学史上闪烁着不灭的光芒。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社会革命论

毛主席指出：“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矛盾论》）”东汉时期的反动统治阶级正是依靠董仲舒泡制的“阳尊阴卑”一套反动形而上学来为豪族大地主的特权统治辩护，胡说什么“阳”永远占主导地位，“阴”只能服从“阳”，尊卑上下的地位是不能转变的^①，其目的就是强迫广大农民甘心接受他们的奴役。

黄巾起义农民一眼看透封建统治者这套谬论的反动实质，针锋相对地指出，“夫阳极者能阴，阴极者能阳，此两者相转，比若寒尽反热，热尽反寒，自然之数也。”^②“阳极者当

①《春秋繁露·基义》

②《太平经》卷88

反阴，阴极者当反阳。”^①即是说：阴和阳这两个对立物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依据一定的条件向它的反面转化，这个条件就是“极”。这两者的变化，就好象寒来暑往、冬去夏来一样，都是自然变化的法则。这种“阴阳”两者相转，“极”则必反的观点，直接批判了董仲舒泡制的“阴阳合一”“阳尊阴卑”的反动形而上学。

革命农民运用“极”则必“反”的哲学观点来观察社会现实，认为“极于下者当反上”，^②封建等级压迫下处于最底层的劳动人民受苦受难达到极点，起来造封建统治者的反，完全符合“自然之数”。黄巾起义军所提出的战斗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③正是根据这种朴素的矛盾转化观得出的政治结论。它鲜明地指出：代表东汉地主阶级政权的“苍天”已经完全腐朽了，奄奄一息，而代表农民革命政权的“黄天”，应该建立起来，在社会矛盾已极端尖锐化的当今甲子年起来造反，完全符合“自然之数”，一定能够成功。

东汉的豪族大地主把自己的特权统治说成是“受命于天”，依靠董仲舒鼓吹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反动形而上学来论证自己的政权是不可改变的；并玩弄所谓的“凡物必有合”^④的中庸之道的诡辩，把尊卑上下的对立说成是互相合作的关系，“虽有不合者、必归于合”，^⑤妄图否认统治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阶级对抗关系。黄巾起义农民针锋相对地指出：代表统治阶级的“苍天”和代表农民阶级的“黄天”，是根本对

①《太平经》卷86

②《太平经》卷42

③《后汉书·皇甫嵩传》

④《春秋繁露·基义》

⑤《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立的,不可调合的.既不能互相合作,也不能和平共处,“苍天”垮下去,“黄天”立起来,“苍天”必然死,“黄天”必然立。现在,头裹黄巾的农民,拿起武器,举行革命,“破苍天、立黄天”,就是要用“黄天”来代替“苍天”,“变”地主贵族之天下为农民之天下。黄巾起义军这种“变天”的思想是造反有理的宣言,是对董仲舒“天不变”论的尖锐批判,充分体现了黄巾起义农民在朴素辩证法的思想指导下,奋起打翻反动政权,“敢教日月换新天。”(毛主席诗词,《到韶山》一九五九年六月)的坚定革命信念。

黄巾大起义用革命的暴力,摧垮了东汉王朝,沉重地打击了世家豪族这一腐朽势力,多少调整了生产关系,大起义后出现了“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的局面,豪强地主有的被杀,有的逃跑,很多田地回到农民手中,为三国时期法家路线得以一度推行创造了历史前提。

黄巾大起义用自己的革命哲学,猛烈冲击了两汉时期的官方哲学。对统治阶级的“独尊儒术”的反动政策和董仲舒之流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实行了革命的大扫荡,迫使魏晋时期的门阀豪族不得不变换手法,借助于儒道联盟的玄学来继续维持思想统治。

黄巾大起义制定并加以实践的一“平”二“公”政治经济纲领,典型地表现了前期封建社会农民革命理想的特征。黄巾军提出的破“苍天”、立“黄天”的革命辩证法思想,对以后历次农民革命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六、隋末农民起义的发动者王薄的“世事可知”论和暴力革命思想

公元八五一年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南北朝长期的分裂局面，继秦汉之后，我国又出现了多民族的政治统一。国家的统一，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使隋王朝短期内成为一个强盛的封建帝国。但隋朝封建统治集团代表着门阀豪族的利益，以疯狂的手段加紧对劳动人民的奴役和剥削。公元六〇四年隋炀帝杨广上台以后，更是倒行逆施，横征暴敛，为了满足无穷食欲，役使几百万民工去营建东都洛阳，大筑林苑，大修行宫，大开运河，大造楼船，强选民间美女入宫，宫廷乐舞队竟达三万多人；又经常带领后妃、诸王、文武百官、僧尼道士等一大群乘船几千艘外出游乐，单是强征来拉纤的船夫就达八万多人，并强迫沿途几百里的老百姓“献食”。封建统治者这样不顾人民死活的骄奢淫逸，迅速加剧了国内阶级矛盾。隋炀帝为了炫耀武力，还征发大量人力物力，任意发动侵略战争，三次出兵攻打高丽，都以失败告终，出征的丁夫大半死亡。侵略战争带来的无限度的徭役和沉重的赋税，使“耕稼失时，田畴荒芜”，“百姓穷困，财力俱竭”，以至“人饥相食，邑落为墟”，把广大农民推向死亡的深渊，终于点燃了农民革命的怒火。

战争引起革命。隋炀帝侵略高丽的不义战争，正是埋葬隋王朝的农民大革命的导火线。这次农民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是由王薄在山东长白山首先点燃的。王薄在发动起义的实践过程中，集中了广大农民的革命智慧，预见到隋王朝对内残酷剥削

压迫，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必然导致灭亡，因而提出了朴素唯物主义的“知世”说，并热烈歌颂了劳动人民拿起武器来进行暴力革命的正义性。这对于“共苦隋政”、奋起斗争的广大农民，是极大的鼓舞；对于隋王朝为维护黑暗统治而拼命宣扬的儒、佛、道唯心主义的反动说教，是沉重的打击。

“世事可知”的朴素唯物主义

隋朝统治者在残酷压榨劳动人民的同时，大搞儒、佛、道的反动思想同盟，用宗教欺骗来补充儒家唯心主义。隋炀帝一上台，一方面把孔老二尊为“先师尼父”，鼓吹要“博访儒术”，把孔孟之道说成是“人伦之本”、“立身之基”；另一方面，又大肆提倡佛、道二教，到处建立寺庙，扶植僧侣贵族，修治佛经就达二万九千多部，妄图这样来散布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和不可知论，麻痹劳动人民，使劳动人民放弃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要求，安于现状，听天由命，任凭封建统治者的宰割。

为了揭露封建统治者玩弄的这套愚民政策，动员和鼓舞劳动人民起来进行斗争，山东邹平县农民出身的铁匠王薄，首先举起了革命造反的旗帜，在贫苦农民中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戳穿儒、佛、道三教所编造的各种歪曲现实、掩盖矛盾、愚弄人民的谎言。

孔孟宣扬“圣人先知先觉”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反动谬论，佛教、道教则鼓吹虚无主义的“出世”哲学，王薄与之针锋相对，豪迈地自号“知世郎”，明确宣称“世事可知”，肯定客观现实世界的各种事变都是可以被革命人民所认识的。王薄根据对“世事”的深刻认识，作了《无向辽东浪死歌》等，号召广大被压迫人民昂起头来，都作“长白山前知世

郎”^①，认清隋炀帝这个“昏君”的黑暗统治是长不了的，预见到世道正在变化，只要劳动人民手里的“竹竿上有了枪头”，就会使“昏君身上没了人头”，隋王朝灭亡是不可避免的。^②王薄的这种“知世”哲学，是对柳下跖深知“人事”、不信“鬼事”和陈胜痛斥“祸福在天”、只讲“人间近事”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继续发展，是对孔孟儒家及一切唯心主义认识路线的有力批驳。

孔孟儒家鼓吹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和先验论，诱骗人们背向现实，要人们去“知天”、“知天命”；王薄坚持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和可知论，提出要“知世”，就是要认识了解现实世界。“知天”和“知世”，一字之差，正表现了两条认识路线的根本对立。

孔孟儒家鼓吹“上智下愚”，诬蔑劳动人民是“困而不学”，“不知天命”的“下愚”、“群氓”，是天生的被统治者；王薄针锋相对地指出，劳动人民最“知世”，卑贱者最聪明，革命群众最懂得革命暴力势不可挡，侵略战争必然失败，决不为封建统治者发动的侵略战争去浪死辽东，而要举起大刀长矛造封建统治者的反，直到把隋炀帝这样的“昏君”的头砍下来。

王薄宣称“世事可知”，号召作“知世郎”，就是动员广大农民正视现实，揭露矛盾，从自己受剥削、受奴役的现实生活中来认识隋王朝的残暴腐朽，认识自己受苦受难的社会原因，认识封建统治者的滔天罪恶。这种罪恶，正如稍后农民起义军在讨伐隋炀帝的檄文中所愤怒揭发的：“一时收十岁之租，一日枉千金之费，夫行妇寡，父出子孤”，“痛结人心，悲缠

^①曹德：《类说》引《河洛记》

^②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民间故事选》

华夏”！“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①朴素唯物主义的“知世”哲学，是革命农民认识现实世界的精神武器。

“提刀向前”的暴力革命思想

认识现实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现实世界。革命农民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意识到要改变封建统治的黑暗世界，必需拿起武器来进行斗争。王薄在发动和领导起义的过程中，首先号召敛铁器、做枪头。长白山区的贫苦农民齐心响应，家家只留一把菜刀，把大小铁器都改铸成刀枪，组成“手使竹竿枪，天天打胜仗”的第一支农民革命武装，迅速发展壮大，占领了山东两府三州三十三县，点燃了隋末农民大革命的燎原烈火。在战斗中王薄所作的几首政治鼓动歌谣，充分表现了觉醒了的农民意识到只有用武器批判才能改造现实世界的暴力革命思想，是我国农民革命文献中极为宝贵的战斗诗章。

“长白山前知世郎，纯着红罗锦背裆。

长稍（音朔、长矛）侵天半，轮刀耀日光。

上山吃獐鹿，下山食牛羊。

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

臂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②

“要抗兵（征壮丁），要抗选（选美女），

家家都把铁器敛，

敛起铁来做成枪，

昏君赃官杀个光！”^③

① 曹健，《类说》引《河洛记》，《资治通鉴》卷一八三

② 《古谣谚》卷八十五

③ 《中国民谣》

这里，“知世郎”王薄揭示了一个重要的革命真理，就是劳动人民要反抗剥削压迫，打掉封建帝王的淫威，反对统治者发动的侵略战争，扫荡其势汹汹的“官军”及其大小主子“昏君赃官”，一句话，要改造封建统治的黑暗世界，唯一的办法是拿起刀枪来展开武装斗争，实行暴力革命；劳动群众一旦组织起来，团结战斗，“家家都把铁器敛，敛起铁来做成枪”，“长白山头百战场，十十五五把长枪”^①，并且“提刀向前”，扫荡“官军”，就一定可以把“昏君赃官杀个光”，杀出一个“人人得太平”^②的理想世界。

正是在王薄这样富有战斗性的朴素唯物论和暴力革命思想的动员和鼓舞下，广大贫苦农民纷纷投入了革命洪流。革命真理与群众实践相结合，星星之火，顿成燎原之势。隋末农民大革命的疾风暴雨，终于埋葬了“甲兵强锐”的隋王朝。各路农民军，坚持了长期的武装斗争，“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③，“官人贪浊者皆杀之”^④，“见人称引书史辄杀之”^⑤；荒淫残暴的隋炀帝吓得神经错乱，摸着自己的脑袋日夜悲叹：“我这个好头颅，不知谁来砍它”，最后也落得个被缢死的下场。恩格斯指出：革命暴力“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反杜林论》）。隋末农民军的革命锋芒所向，对门阀豪族这一极端黑暗腐朽的社会势力给予了摧毁性的打击，对一批“方领矩步”的反动儒生实行了无情的镇压。经过这次革命的大扫荡，出现了“学者沦丧，儒教凌迟”，“后进之士不复闻诗书之言”^⑥的大好局面，为

①、②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民间故事选》

③、⑤《资治通鉴》卷一八二

④《旧唐书·杜伏威传》

⑥《隋书·儒林传》

唐代前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法家路线得以推行创造了历史前提。

隋末农民起义的武器批判和批判武器，在我国历史上都放射着灿烂的光芒。

七、唐末农民革命领袖黄巢的 “均平”纲领和“冲天”哲学

隋末农民大起义所推动的社会发展，到唐中期以后又停滞下来。经过“安史之乱”的唐王朝，政治日趋腐败，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官僚大地主疯狂兼并，封建朝廷恣意搜括，广大劳动人民又被推进“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冻无衣，饥无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哀号于道路，逃亡于山林”^①的苦难深渊。唐末藩镇之间连年混战，加剧了社会危机，“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②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极端尖锐化。从九世纪初起，各地农民起义已风起云涌，终于汇成席卷全国的农民革命大风暴。

唐末农民革命领袖黄巢（公元？——884），山东冤句（今曹县北）人，年轻时，“粗涉书传”，长于骑射，为反抗唐王朝官营盐价猛增到三百七十多倍，曾从事武装贩运私盐的活动。公元八七四年王仙芝起义于长垣（今山东濮县），次年黄巢即在曹州聚众几千人起义响应。由于黄巢在起义军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坚持了农民革命路线，不断战胜了内部的妥协投降倾向，不断粉碎敌人的武力镇压和招安诱降阴谋，因而能够率领日益壮大的起义军，奋战十年，纵横万里，把革命烈火燃遍全国，以“冲天”的革命气概杀进长安，把唐朝的腐朽统治冲得七零八落，取得了农民革命战争的辉煌胜利，同时，在

①《金唐文》卷八十四

②李绅：《悯农》

群众斗争的大风雨中，反映广大农民的革命要求，鲜明地提出了以“均平”和“冲天”为核心的政治纲领和思想纲领，把我国农民的革命哲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问罪”天子的农民革命路线

黄巢领导农民起义军坚持“问罪”天子的农民革命路线，把斗争的矛头直指最高封建统治者——皇帝。他把冲翻封建统治，夺取全国政权作为革命目标。

为了维护腐朽的封建制度，封建卫道士韩愈，继承儒家传统，提出极端反动的“道统”论，大肆鼓吹“顺天”、“应道”，极力反对“去圣人之道，舍先王之法”。^①妄图用这套反动的“道统”论来证明封建帝王神圣不可侵犯，维护封建统治，防止人民造反。

黄巢坚持斗争哲学，把反动的“道统”论踩在脚下，决心冲破唐王朝的“道统”和“法统”，提出了“问罪”天子的农民革命路线。这条革命路线是在革命发展过程中，经过同封建统治者的激烈战斗，才明确提出来的。黄巢自公元875年在山东曹州起兵响应王仙芝，曾与王仙芝会合，攻占州县，“横行山东”，连续粉碎了唐官军的两次反革命围剿，转战到河南、安徽、湖北地区，革命力量迅猛发展，战绩辉煌；公元877年与王仙芝分裂后横渡长江，转战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各省。公元879年，攻下广州，起义军发展到数十万人。同年，黄巢从广州誓师北征，挥戈直指封建统治中心长安，北征途中，向唐朝诸州道，发布命令说：“各宜守垒，勿犯吾锋！吾将入东

^①韩愈：《与孟尚书书》

都，即至京邑，自欲问罪，无预众人！”^①这就表明，农民军将直接“问罪”唐天子，用革命暴力，推翻反动的唐王朝。这篇打倒封建皇帝的战斗宣言，粉碎了韩愈维护封建皇权的“道统”论，也抛开了法家柳宗元等指靠皇帝支持革新的主张，为农民革命树立了光辉的旗帜。

黄巢“问罪”天子的革命路线，也是在农民军内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早在公元876年，农民军攻占蕲州（今湖北蕲春县）后，被王仙芝引为“谋主”的唐朝反动官僚——王镣、裴渥等，阴谋策划，引诱王仙芝接受招安。当朝廷送来授予王仙芝“左神策押牙兼监察御史”官衔的诏书时，王仙芝“甚喜”，王镣、裴渥等连忙“道贺”。这时，黄巢拍案而起，怒斥投降派王仙芝说：“当初，咱们‘共立大誓，横行天下’，如今，你个人却想去投降取官，你把五千起义弟兄置于何地！”并挥拳把王仙芝打了一个头破血流，广大起义军也同声怒骂不止，“仙芝畏众怒，遂不受命”。^②黄巢与起义军的坚决斗争，制止了王仙芝这次叛卖活动。由于路线分歧不可调和，黄巢终于同王仙芝分裂，率军二千独立作战。后来王仙芝以五万之众围攻襄阳，投降派的本性难移，又派人去洛阳谈判招安，由于投降主义路线不得人心，将士纷纷离散，王仙芝终于失败被杀。

黄巢坚持“问罪”天子的革命路线，越战越强。抛弃王仙芝投降主义路线的农民军将士，踊跃参加黄巢的部队，推黄巢为王。黄自号“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改元“王霸”。^③明确表示与封建朝廷势不两立。唐王朝除用军事镇压外，也对黄巢施

①《资治通鉴》卷254。

②《资治通鉴》卷252。

③《资治通鉴》卷258。

展诱降阴谋。公元878年，唐王朝以就地解散起义军为条件，答应授予黄巢以“右卫将军”的官职；公元879年，黄巢兵临广州城下，广州节度使李迢之流建议朝廷以高官诱降黄巢，唐王朝答应给予正四品“率府率”。对这些诱降条件，虽经谈判，但黄巢终于“大怒未受”。^①

正是在粉碎唐王朝的诱降阴谋和起义军内部投降派的斗争中，黄巢更加坚定地领导农民起义军执行“问罪”天子的革命路线，“横行天下”。起义军所到之处，杀富济贫，开仓分盐，严惩贪官豪绅，唐官军望风披靡。公元881年1月，“白旗满野”，纪律严明的六十万农民军，在“举军大呼，声振河、华”^②的凯歌声中，赶走了皇帝，占领了长安，建立了“大齐”农民政权，对皇帝、贵族、官僚大地主实行严厉镇压，“杀唐宗室无遗类”。^③“甲第朱门无一半”，“天街踏尽公卿骨”。^④农民军的革命暴力行动，大长了劳动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地主阶级的威风。黄巢坚持“问罪”天子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反对封建制度的“均平”纲领

在唐代，公元八五九年浙东农民起义军铸印“天平”；王仙芝发动起义时以“天补均平”作号召；黄巢自号“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把“均平”两个闪光大字写在战旗上，在我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均平”的革命纲领，标志着广大农民在斗争中锤炼出了新的思想武器。

①《资治通鉴》卷253。

②《资治通鉴》卷254。

③《资治通鉴》卷254。

④韦庄：《秦妇吟》。

农民革命的“均平”纲领，是针对封建制度下贵贱对立，贫富悬殊的不平等的黑暗现实提出来的。中唐以后的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①全国大部土地成为地主的庄园。封建统治者贪得无厌，穷奢极欲。唐懿宗李崔嫁女，一次赐钱五百万缗，几乎相当于朝廷全年的税收。不少大地主拥有佃户几百户，每年积粟达一万石。而广大农民过着“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取橡实”，“自冬及于春，橡实诳饥肠”^②的悲惨生活。这种富与贫、贵与贱、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极端不平等，正是罪恶的封建制度造成的。封建统治者及其文化奴才编造各种谬论辩护这种罪恶制度。唐代以继承孔孟道统自居的反动儒家头子韩愈，就拼命叫嚣：“富与贵，祸与福存乎天”；老百姓必须把“粟米丝麻”，“器皿”，“货财”等全部劳动果实拿出来供统治者享受，否则就要杀头。^③黄巢大起义提出的“均平”的战斗纲领，就是要反对剥削压迫，打翻吃人的封建制度，改变那种土地财产不平均，权利义务不平等的社会状况。这是广大农民的革命愿望的深刻反映，是对孔孟儒家鼓吹“野人养君子”的“天下之通义”等反动纲常的有力批判。

列宁指出：“在反对旧专制制度的斗争中，特别是反对旧农奴主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

（《社会民主党在1905年——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黄巢提出的“均平”纲领及其所建立的农民政权国号“大齐”，^④正是反映了在反对封建农奴制的斗争中的革命农

① 陆贄：《陆贄公集》卷二十二

② 张籍：《野老歌》。皮日休：《橡实叹》

③ 韩愈《原道》

④ 《资治通鉴》卷254

民，已经明确要求政治上的平等和经济上的“平均”，要求变不平均为平均，变不齐为大齐。黄巢起义军并以革命行动来实践这一革命纲领。公元八七八年，起义军南征到浙江天目山区，曾把官府囤积的大量的盐，夺过来分给了广大的贫苦人民，公元八七九年，起义军从广州北伐时，黄巢以“义军百万都统”的名义发表文告，宣布“禁止刺史搜括民财，县官贪污的全家处死”。公元八八一年进军长安时，所到之处，镇压了大批皇室贵族，官僚豪绅，剥夺他们的财产，并打开仓库，救济贫苦农民，“千斯仓兮万斯箱，黄巢过后犹残半”，^①对封建经济关系实行了猛烈的冲击。起义军在长安向广大人民义正词严地宣布：“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

黄巢起义军的“均平”纲领及其革命措施，引起被打翻在地的贵族官僚的刻骨仇恨，他们咒骂：“自从大驾去奔西（指唐僖宗逃去四川），贵落深坑贱出泥。……扶犁黑手翻持笏（象征权力的手版），食肉朱唇却吃齑（切碎的腌菜）。”^②这却从反面反映出“均平”纲领的革命威力。把皇帝一赶跑，贵和贱、富与贫的封建社会关系就完全翻了个个儿，昨天扶犁的黑手即劳动人民掌握了印把子，从前的食肉者即剥削阶级寄生虫也不得不尝尝腌菜味，正好与过去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③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无怪乎劳动人民热烈欢呼：

“高高山上一盏灯，天下穷人都苦寒；不是黄巢来造反，谁杀赃官八百万”。这首民歌永远纪念着黄巢大起义的革命功

① 韦庄：《秦妇吟》

② 《旧唐书·黄巢传》

③ 何光远：《知不足斋丛书》

④ 杜甫《自京赴奉先咏怀》

勋。

敢于“冲天”的战斗唯物主义

黄巢敢于提出“问罪”天子的革命路线和“均平”纲领，是以反天命的“冲天”思想作为理论基础的。黄巢的“冲天”思想，是长期以来日益觉醒的劳动人民不信天命干革命的光辉思想的新发展，是对孔孟儒家一贯宣扬的唯心主义天命论的一次革命大批判。

从董仲舒到韩愈，为封建统治者炮制的官方哲学，其核心就是用唯心主义的天命论来论证封建统治的合理性。董仲舒鼓吹“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韩愈叫嚣“天”具有“赏功罚祸”的无上权威，谁违反“天意”，就会遭到“天刑”“天殃”。因而要人民“顺天”，说“所谓顺乎在天者”，“贵贱穷通之来”，“平吾心而随顺之”。^①而且恶毒地提出“诛民”说，“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②他们无非都是想用捏造的天上的神权来维护地上的君权，维护君、臣、民的等级秩序。唐代中期，法家与儒家曾经围绕“天”是否有意志的问题展开大论战，法家柳宗元、刘禹锡对儒家韩愈的“天命”叫嚣给予了猛烈批判，并对“天”作出了唯物主义的解释。但法家局限于地主阶级的立场，要维护封建“法制”，宣称“人能胜乎天者，法也”。^③所以法家不会也不可能去“冲天”。黄巢反映农民阶级的革命要求，破天荒地提出了“冲天”的战斗唯物主义思想，与儒家的

①韩愈：《与己中行书》

②韩愈《原道》

③刘禹锡：《天论》

唯心主义的天命论相对抗，并把这种“冲天”思想付诸实践，化为广大群众冲击旧世界的革命行动。

黄巢早年写过一首《咏菊》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诗中把农民革命力量比做傲霜盛开的“秋菊”，把封建腐朽统治比作即将衰谢的“百花”，一旦时机到来，农民革命力量必将摧毁封建腐朽统治，农民革命的“冲天”理想就将随着农民的革命武装“黄金甲”杀进长安城而胜利实现。起义后，黄巢自称“冲天大将军”，坚持“问罪”天子的革命路线，就是要冲破封建网罗，冲翻封建统治，杀去长安夺鸟位，誓为农民建政权。黄巢的“冲天”思想和“冲天”行动，体现了革命农民“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表白了对封建腐朽势力必败、农民革命力量必胜的坚强信念。黄巢在领导农民军向唐王朝勇猛冲杀中，特别是在农民军内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锤炼出了“冲天”的唯物主义思想，对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作了高度的哲学概括。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揭露黑格尔唯心主义关于“天”、“神”等的呓语时深刻地指出：“天——自然界——精神。打倒天：唯物主义”。一切唯心主义在自然物质现象和人类精神生活之上去虚构一个“天”是完全荒谬的。“打倒天”，撕破唯心主义的天命神权之类的谎言，还世界以本来面目，就是唯物主义。黄巢的“冲天”思想，正是在与儒家唯心主义的天命论作斗争中发挥出的“打倒天”的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思想精华。它武装广大革命农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于“冲天”，把什么“畏天命”、“顺天”、“君权神授”、“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等等反动谬论，通通砸个稀巴烂。在“冲天”思想指导下，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其势如暴风骤雨，

迅猛异常，冲得反动官军一败涂地，冲得封建皇帝放声大哭，冲得李家王朝土崩瓦解，把前期封建社会中反动统治阶级作为精神支柱的唯心主义天命论也基本上冲跨了，迫使北宋以后封建统治者不得不把“天命”论改装为“天理”论，变换官方哲学的招牌，充分显示了农民革命哲学的批判威力。

“冲天”，集中表达了农民革命路线的世界观基础。究竟是“冲天”还是“顺天”，是农民起义中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根本对立。《水浒》作者要宋江在浔阳楼题诗：“敢笑黄巢不丈夫”；而宋江正是打着“顺天”“护国”的黑旗去接受招安的。这已充分暴露了《水浒》所宣扬的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及其反动世界观基础，和历代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及其哲学基础是针锋相对，水火不相容的。把两者混为一谈，是对历史的根本歪曲。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唐末黄巢大起义以“冲天”思想和“均平”纲领动员和武装了广大革命农民，奋起战斗，用革命暴力彻底扫荡了门阀豪族残余势力，猛烈冲击了封建统治及其精神支柱，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文化的发展，推动着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过渡。黄巢大起义所提供的哲学武器，是我国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中的珍贵遗产，在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八、宋代农民革命领袖方腊的 “法平等”思想和“明暗”转化的发展观

自从唐末农民大起义从根本上摧毁了“以身份为差”的世家豪族势力及其阶级基础后，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后期发展阶段。北宋王朝建立了“以贫富为差”的封建等级制度，按占有土地的多少来划分社会的等级，用以巩固官僚大地主在政治经济上的统治地位。他们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纵容官僚大地主肆意兼并土地，造成土地高度集中，农民大批破产，占百分之七十的贫苦农民丧失土地，百分之七十的土地被一小撮官僚大地主所霸占。在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下，广大农民贫苦已极，“所食者糠粃而不足，所衣者绌褐而不完。”^①农民愤怒了，起义的烈火到处燃烧。宋王朝实行“守内虚外”的政策，^②对农民起义实行残酷镇压；对辽、西夏和金贵族的军事掠夺则妥协投降，每年向他们贡纳大量财物，以换取苟安局面。沉重的赋税徭役又转嫁到劳动人民头上。沉重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迫使农民不断地举行起义。封建卫道士们惊呼：农民起义“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似一伙，天下祸患，岂不可忧”！^③

面临“天下大乱”的危局，官僚地主阶级的辩护士二程、司马光之流精心炮制了一套唯心主义的理学，说什么“天命即

①《宋史》《食货志·农田》

②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

③李燾：《续资治通鉴长编》

是天理”，^①贫富贵贱的等级差别不仅是“天命”决定，而且是“天理如此，岂可逆哉！”^②妄图用这套唯心主义的理学，宣扬“剥削压迫有理，造反无理”的反动谬论，为封建等级法权辩护，阻挡劳动人民的革命洪流。

但是，宋代农民不畏天命，不信天理，发起了向封建法权的进攻。继王小波，李顺之后，北宋末年（公元一一二〇年）爆发了以方腊为首的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方腊高举“法平等”的革命大旗，带领浩浩荡荡的百万大军，以不可阻挡之势向赵宋王朝进攻，迅速占领了江南地区六州五十二县，建立了“永乐”革命政权。这次以“法平等”为革命纲领的农民起义，大反封建法权，狠批反动“理学”，动摇了赵宋王朝的政治思想统治，在农民革命哲学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页。

摧毁封建法权的“平等”纲领

宋代封建制度等级森严，官僚大地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享有各种特权。他们依仗这些法权，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实行敲骨吸髓的剥削。反动的理学给这种封建等级制披上了一层“天理”的外衣，说什么“尊卑贵贱”的等级差别是“天下之定理”，^③“差等有别，莫敢逾僭。”^④谁要反对封建法权，统治者就要以理治罪，予以镇压。

宋代起义农民对理学辩护的封建法权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早在公元九九三年，王小波、李顺就继承唐末黄巢起义的“均

①《朱子语类》

②《二程遗书·语录》

③《二程遗书·语录》

④《二程全书·论十事札子》

平”思想，提出了“均贫富”的革命口号，^①对封建社会的“贫富不均”现象进行了革命扫荡。出身雇工的方腊，深受封建等级制度的摧残，对封建法权深恶痛绝。他发展了王小波、李顺“均贫富”的革命思想，坚持斗争哲学，勇敢地向封建法权进攻。他尖锐地指出宋王朝的“法”是“无平等，有高下”，^②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是法平等，无有高下”^③的革命纲领，表达了劳动人民反对等级特权、争取政治平等的革命要求。在反对封建法权的斗争中，“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列宁：《社会民主党在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它唤起千百万农民群众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同封建统治进行斗争。方腊把“法平等，无有高下”的革命思想写成文章，刻版印刷，四处张贴，广泛发动群众。起义后，他自号“圣公”，建元“永乐”，南面称君，公开地同封建地主阶级的总头子——皇帝作对；义军所到之处，“搜求官吏”，^④“劫取大家财”，^⑤“见官吏，公使人，皆杀之”，^⑥从政治和经济上对贪官污吏恶霸地主进行沉重打击，动摇了封建统治基础。他利用“明教”组织农民军。在起义军中实行“官兵一致”，平等互助的原则：“一人有难，众人相助。”^⑦“有福同享，有祸同当。”^⑧“凡起义军成员，虽不相识，往来经过，

①王辟之：《湘水燕谈录》卷八

②庄季裕：《鸡肋编》

③同上

④《宋史·陈遵传》

⑤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处州东岩聚民祠堂碑铭》

⑥洪迈：《客斋逸史》

⑦“有其贫者，众人率财以助”。（庄季裕：《鸡肋编》）

⑧“一家有事，同党之人皆出力以相赈恤。”（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都管吃管住，财物取用，不分彼此，当是一家人”。^①

针对理学“男尊女卑”的反动说教，方腊还提出“男女无别”^②的革命口号，发动妇女参加起义。被压在社会最低层的广大妇女，在起义军中冲锋陷阵，表现了与封建法权势不两立的战斗气概。方腊之妹方百花就是起义军的女领袖之一。

毛主席说：“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方腊的平等纲领，武装了农民思想，对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进行了深刻揭露和革命扫荡。

在方腊“是法平等，无有高下”的思想影响下，十年之后（一一三〇年）洞庭湖边爆发了钟相，杨么领导的农民大起义。这次起义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③的革命纲领，进一步抨击了贵贱有等、贫富不均的封建法权。钟相愤怒指出：“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④他把维护封建等级特权的“国典”斥为“邪法”，把反映农民革命要求的平等纲领尊为“善法”，宣称要用剥夺剥夺者的革命暴力来摧毁封建法权，在政治上争取平等，在经济上均分财富，^⑤把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提高到新的水平。为了消除方腊的“平等”思想对农民起义的革命影响，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描写北宋末年农民起义的反动小说《水浒》，对革命英雄方腊进行无耻的污蔑，而对投降派宋江则加以美化，把死守封

① “凡出入经过，虽不相识，党人皆馆谷焉。凡物用之无间，谓为一家。”（庄季裕：《鸡肋编》）

② 方勺：《青溪寇轨》

③、④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

⑤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谓贼兵为爷儿，谓国典为邪法，谓杀人为行法，谓劫财的为均平。”

建法度，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派宋江说成是青史留名的“英雄”，而对于不“替天行道”，敢于反对皇帝的农民革命领袖方腊遭到封建统治者的残酷镇压，却拍手叫好。然而，方腊的英雄形象不是一两部反动小说所能诋毁得了的。他的战斗精神一直为后来反封建的革命农民所继承和发扬。

对唯心主义理学的革命批判

北宋反动统治阶级炮制了一套唯心主义理学来论证贫富贵贱的等级差别和等级压迫是完全“合理”的，妄图用诡辩手法来掩盖矛盾，粉饰太平。

“等级差别”的封建特权统治是“合理”的吗？方腊在起义前夕的一次漆园动员大会上，从朴素唯物论的认识路线出发，对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现实，对封建等级制度的罪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他控诉道：“劳动人民世代耕织，终年劳苦，稍有收成，全被拿光，稍不如意，就鞭抽棒打，这是‘合理’的吗？”“终岁劳苦的，求一日饱食而不可得；安坐享乐的，尽情挥霍而有余。这是‘合理’的吗？”“对辽、金贵族，贡献唯恐不足；对劳动人民谴责无所不至。这是‘合理’的吗？”群情愤慨，齐声答道：“岂有此理！”方腊进而揭露封建法权的“无理”统治就在于纵容统治者的“剥削”，把劳动人民的“膏血”榨取得“无锱铢遗”。最后，他说出了劳动人民的心里话：“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①用统治阶级的罪行和劳动人民的血泪斑斑的家史，驳斥了唯心主义理学“剥削有理”的反动谬论。

对于“岂有此理”的封建统治，是屈膝投降还是奋起反

^①洪迈：《容斋逸史》

抗？理学家们挥起“天理”的恶棒威胁道：“天命即天理”，反对最高封建统治者皇帝就是“非命”“无理”。对于封建法权统治，要“勇于从而顺命，无可逃而待烹”，^①放弃革命斗争，听任统治者任意宰割。针对这套“顺命”哲学，方腊鼓动起义群众说，腐朽黑暗的封建统治，“于汝甘乎”？群众坚决地回答：“不能！”进而又问：“大家看怎么办？”群众响亮地回答：“唯命！”（听你的指挥！）^②听天由命的理学被揭露得越深，群众的革命觉悟提的越高。方腊根据当时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广大人民迫切要求革命的形势，提出了“仗义而起”的革命口号，举起了革命造反的大旗，一场反特权、争平等的农民武装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方腊“仗义而起”的革命路线，矛头直指赵宋王朝，这同《水浒》中宋江执行的“顺天”“护国”“忠君”的投降路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方腊分析当时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错的特征，估计到革命的星星之火即将燎原的形势，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了胜利的信心。什么“纲常万年，磨灭不得”！只要“仗义而起”，“旬日之间，万众可集”；只要善于利用矛盾，造成南北夹攻之势，“我但划江而守”，以东南作革命根据地，储粮备战，发展革命力量，就可以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从雄据东南到驰骋中原，“十年之间，终当混一。”革命农民就可掌握全国政权了。方腊这篇富有战斗激情的精采演说，充分体现了革命农民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革命乐观精神，是发动群众狠批“天理”谬论，横扫封建法权的宣战书。

①张载：《正蒙·西铭》

②“诸君以为何如”（洪迈：《容斋逸史》）

③洪迈：《容斋逸史》

④洪迈：《容斋逸史》

方腊不仅从理论上批判了理学，而且在实践上狠狠打击了儒、佛、道反动神学。他坚持“不事神佛祖先”的无神论思想，提倡裸葬。革命运动兴起的地方，“无复丧葬祭祀之事”。^①起义军所到之处，摧毁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意识形态，“焚学宫，杀儒生”；主张“男女无别”，把腐朽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砸个稀巴烂。“由此可见，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而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因此统治阶级惊呼哀叫：“君臣上下，复何有哉！”^②

“明暗”对立转化的辩证发展观

毛主席在批判颠倒光明和黑暗的反动文艺家时指出：“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批判对反动时期的哲学家也是适用的。宋代理学家也就是这类颠倒光明和黑暗的反动物。他们诬蔑农民“仗义而起”的革命行动和“等贵贱、均贫富”的革命要求是“人欲横流”，一片黑暗，而歌颂残暴的黑暗统治“至圣至明”。

恩格斯说：“光和暗肯定是自然界中最显明、最尖锐的对立，它从第四福音书起直到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止，对于宗教和哲学来说始终是一种修辞学上的用语。”（《自然辩证法》）针对颠倒“明暗”的唯心主义理学，方腊利用“明教”教义，

①②廖刚：《高峰文集·乞茶妖教札子》

提出了明暗“二宗”的对立统一观，认定人类社会存在着“明暗”两种对立的势力。高贵者“皆醒醒邪佞之徒”，①代表着黑暗；终岁勤劳的农民代表着光明，二者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他借用宗教形式，“但拜日月为真佛”，②号召农民兄弟为争取光明前途，摆脱黑暗统治而斗争。

面临农民起义的滚滚洪流，理学家们鼓吹倒退史观，说什么“三代以上专以天理行，三代以下专以人欲行。”③把残酷统治人民的奴隶制社会美化为没有矛盾，一片“光明”，是人类社会最辉煌的时期。把由劳动人民艰苦奋斗而推进了的历史诬蔑为一团漆黑，狂叫要“存天理，灭人欲”，实现“克己复礼”，大开历史倒车。

针对这种倒退史观，方腊利用“明教”中关于“二宗”“三际”的经文资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明暗转化的朴素发展观。他认为明暗两种势力的斗争，要经历三个发展阶段（“三际”）。“初际”阶段就存在着明暗的对立，“诸所动静，无不相背”，二者势均力敌，相持不下。无所谓“专为天理行”的光明境界。发展到“中际”阶段，“暗”暂时压倒了“明”，所以劳动人民辗转呻吟于黑暗统治之下。劳动人民不能忍受黑暗统治，努力寻求“解脱”的途经，划清明暗界限，“仗义而起”，推倒黑暗势力，“出离火宅”。“后际”阶段，光明战胜黑暗的时代，必将到来。④

光明必胜！黑暗必败！起义农民对革命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到处杀贪官、斩污吏。反动统治者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他们

①洪迈：《容斋逸史》

②庄季裕：《鸡肋编》

③《朱文公文集·答陈同甫书》

④《摩尼教残经》

手里拿着屠刀，口里念着“度人经”，用假慈悲的佛教来软化人民的革命斗志，妄图诱劝劳动人民忍受苦难，“戒杀”“戒盗”，不要起来造反动派的反。

针对这类“戒杀、度人”，“慈悲成佛”的宗教欺骗，方腊强调了斗争在明暗转化中的重要作用。他斩钉截铁地提出：贪官污吏、地主豪绅和一切反动派是劳动人民的死对头，只有把他们统统消灭光，才能把劳动人民从苦海中救出来。“只有杀人，才能度人”；“只有杀人，才能成佛”。这个“佛”不是虚构的彼岸的“极乐世界”，而是用革命暴力推翻黑暗统治后建立起来的光辉如“日月”的农民天下。这种斗争转化的革命思想化为农民群众诛杀黑暗势力的革命行动，封建统治者感到“最为大患。”^①

恩格斯指出：“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方腊这种明暗对立转化的朴素发展观尽管披着宗教的外衣，但它却反映了广大农民反抗黑暗统治，向往光明前途的革命愿望。

方腊是我国历史上农民革命的杰出领袖，他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和总结出的革命哲学思想，给腐朽的封建制度和反动理学体系以沉重的打击，对后期封建社会农民革命斗争和哲学思想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元末红巾军“杀尽不平方太平”的革命逻辑、明末闯王李自成“除暴、均田”的革命纲领、太平天国“有田同耕、有饭同食”的“天朝田亩制度”，都是在方腊“法平等”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① 庄季裕《鸡肋编》

九、元末红巾军“杀尽不平 方太平”的革命逻辑

公元一二七一年，以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贵族建立了元王朝，一二七九年灭了南宋，统一了全中国。元王朝是以蒙古贵族为首、联合汉族大地主阶级和其他各族上层分子所组成的封建政权。各族劳动人民遭受着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双重灾难。

元统治者推行反动的民族歧视政策，用强制的民族等级制度（把国内各族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北人、南人四个等级）来分化和破坏各族人民的团结和斗争，借以加强封建等级压迫。蒙古贵族曾把大量农田圈占为牧场，把大批农民掠夺为“驱口”（可以任意虐杀、买卖的奴隶）。元中叶以后，贵族官僚大地主更大量强夺民田，残酷剥削农民，不少大地主占田十万亩以上，每亩强收地租高达四石。封建朝廷的苛捐杂税，逐年增加到二十多倍，加以滥发纸币，高利盘剥，元末广大农村出现了“死者相枕籍”、“哭声震野”的悲惨景象。

元统治者为了维护黑暗统治，大肆尊孔崇儒，追封孔丘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孟轲为“邹国亚圣公”，加封程颐为“豫国公”、程颐为“洛国公”，宣称“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规定科举考试一律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准，企图用孔孟程朱之道来捆绑人民的手足；同时，又大肆提倡喇嘛教，借以麻痹人民的反抗意识，强化思想统治。

残酷的阶级压迫、民族压迫和思想统治，只能激起各族人民的愤怒反抗。到元末，黄河南北以弥勒白莲教为秘密组织形

式的农民起义已不断兴起,反抗元统治者的革命歌谣到处传播,终于在一三五一年,我国历史上又一次伟大的农民革命战争——红巾军大起义以不可阻挡之势爆发了。

以刘福通、彭莹玉为领袖的红巾军,在发动起义和武装斗争过程中,坚持了聚义造反的革命路线,提出了“摧富济贫”的战斗纲领,并以“杀尽不平方太平”的革命逻辑,武装了广大群众,横扫了孔孟程朱之道,把我国农民革命哲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挑动黄河天下反”的革命预见

“奉使来时惊天动地，
奉使去时乌天黑地，
官吏都欢天喜地，
百姓却啼天哭地！”

“九重丹诏颁恩至，
万两黄金奉使回。”^①

元末普遍流传的这些民谣，揭露了封建统治者及其爪牙贪残横暴和广大劳动人民困苦不堪的社会现实，表现了当时广大群众已经意识到皇帝不过是贪官污吏的总后台；百姓们要改变自己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只有自己起来造反，才是唯一的出路。“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②

山雨欲来风满楼。农民革命领袖刘福通、韩山童反映了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要求，利用白莲教的组织形式，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发动。他们分析形势，认为“天下当大乱”^③，以独具

①陶宗仪：《辍耕录》卷十九

②黄溥：《闲中古今录》

③《明史·韩林儿传》

只眼的革命预见，判定“天下反”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抓住元统治者调集十多万民工开凿黄河河道的有利时机，事先在河南山东交界的黄陵岗挖河工地上埋下了一个独眼的石人，背刻“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的鼓动口号，又四出散布歌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①独眼石人挖出后，民工们积压满腔的阶级仇恨一下“挑动”起来了。“天下反”！这春雷般的革命号召，使革命烈火迅速燃遍了大河上下，长江南北。公元一三五一年五月，刘福通在颍州（今安徽阜阳）举起了革命造反大旗，随即攻占朱皋、罗山、确山、光州等地，开仓济贫，“贫者从乱为归”，起义军迅速发展到了十余万人。同年八月，彭莹玉、徐寿辉在湖北蕲春一带起义响应，随即占领了武昌、沔阳、江州、饶州等地。南北这两支农民军都头裹红巾，身穿红袄，高举红旗，被群众称为“红军”或“红巾军”。在红巾军的革命号召下起兵响应的，还有萧县芝麻李，南阳布王三，荆、樊孟海马，濠州郭子兴等等。

在刘福通、彭莹玉领导下的红巾军，始终坚持了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一开始就以“天下当大乱”、“挑动黄河天下反”为号召，揭露了元王朝统治下“贫极江南，富夸塞北”的社会矛盾，提出了“倡义举兵，恢复中原”的战略目标，并先后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彭莹玉发动南方红巾军起义后，立即建立了“天完”政权，以压倒“大元”政权之势，迅速摧毁了元王朝在江南及四川等地腐朽统治。刘福通率领北方红巾军，连续粉碎了官军的反革命围剿，一三五五年建立了“大宋”政权，统一了中原各地红巾军的领导，随即指挥红巾军分五路北伐，发布声讨元统治者的檄文，北伐军在战旗上写着：“虎贲

①、②叶子奇：《草木子·克谨篇》；《新元史·韩林儿传》

③见郑嗣趾：《高丽史》卷三九《恭愍王世家》

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决心攻克大都，推翻元王朝的反动统治。

刘福通、彭莹玉坚持的聚义造反的农民革命路线，指引着红巾军转战南北，横扫官军，所向披靡，给蒙、汉地主阶级以沉重打击，引起他们极端仇恨地叫嚷，“磔红头，凿红骨，誓红不同生，灭红到红窟！”^①他们施展反革命两手，一方面武力镇压，另一方面政治诱降。在元统治者封以官爵，赐以龙衣、御酒的招安政策的引诱下，混进苏北一带农民军并篡夺了领导权的张士诚等，推行叛卖投降路线，终于被元朝收买，充当了元统治者镇压红巾军的可耻帮凶。张士诚接受招安后，官封太尉，长期盘踞苏州，于一三六二年竟派遣爪牙攻入红巾军政权的首都安丰（今安徽寿县），屠杀了红巾军领袖刘福通，博得了江南地主官僚的齐声喝采。《水浒》的作者、反动文人施耐庵、罗贯中，都是在红巾军打击之下“年荒世乱走天涯”^②的逃亡地主，曾去依附农民革命叛徒张士诚，作了张的幕僚，充当了地主阶级“灭红到红窟”的谋士。他们在《水浒》中所发泄的对方腊及整个农民革命派的仇恨，正反映了他们对红巾军的仇恨；《水浒》中精心塑造了宋江这个投降派典型，并加以狂热歌颂，正表现了他们对张士诚之流的感情。元末农民起义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水浒》作者基于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作了完全颠倒的反映。

“民起怨，事必变”的辩证历史观

在元末红巾军大起义前夕革命风暴的酝酿中，广大农民喊出了“天遣魔军杀不平”^③的战斗口号，传播着“天雨线，民

① 杨雄植：《铁崖逸稿注》卷二《李铁枪歌》

② 施耐庵诗，引自《江海学刊》一九六一年第六期《关于施耐庵的传说》

③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七

起怨，中原地，事必变”^①的革命民谣，深刻地表现了起义农民的革命觉悟和哲学智慧。

劳苦农民为什么必然要奋起造反？红巾军简短明确地回答是由于“不平”。“不平”，是革命农民对元朝黑暗统治的愤怒控诉，是他们对整个封建制度的深刻概括。列宁指出：“农民小资产者的平等思想是正当的和进步的，因为它反映了反对封建农奴制的不平等现象的斗争。”（《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广大农民反对“不平”，要求平等，就是要求改变封建制度下贫富贵贱极端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而封建统治阶级的哲学卫士，从董仲舒到朱熹都大肆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三纲五常，终变不得”之类的谬论，用以欺骗和麻痹劳动人民。针对这种反动的形而上学，红巾军反映广大农民“穷则思变”的革命要求，提出了“中原地，事必变”的朴素的辩证历史观，认定元朝统治下极端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一定会改变，满腔仇怨的劳苦人民奋起斗争，就一定能变“不平”为“太平”，变黑暗为光明。这种闪烁着革命光芒的辩证法思想，为红巾军团结战斗的革命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南。起义军领袖刘福通、韩山童在发动和组织群众的过程中，利用了民间早已流行的弥勒白莲教的宗教语言，宣传社会变革思想，“天下当大乱，弥勒佛下生”^②！满怀胜利的信心宣告：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要到来！鼓舞着千百万起义农民为推翻元朝统治、实现“太平”理想而斗争。

革命农民在斗争实践中意识到了“事必变”是由“民起怨”引起的。广大劳动人民在残暴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下所积累起来的怨恨和仇恨，一旦爆发出来，势必造成“天下反”的社

①《元史·五行志》

②《明史·韩林儿传》。

会激变。元末红巾军继承和发展了汉末黄巾军曾提出的“小民从来不可轻”的革命历史观，进一步认定“民”是“变”的主体，“民起怨”是引起“事必变”的根本动力。社会现状的必然改变，把“不平”变为“太平”，把黑暗变为光明，决定的力量不是什么皇天上帝，不是什么王公大人，而是劳动群众不堪忍受黑暗统治和贫困生活所必然掀起的斗争。这种把“事必变”归结为“民起怨”的深刻思想，从根本上否定了孔孟儒家宣扬的“上智下愚”的反动史观以及“贫而无怨”、“小人易使”之类的反动谬论。红巾军起义中，流行着这样的民谣：“塔儿黑，北人作主南作客；塔儿红，朱衣人作主人公。”^①革命农民坚信：“红”（代表农民革命力量）与“黑”（代表元朝统治势力）两种势力的消长，决定了“主”（统治者）和“客”（被统治者）对立地位的转化，红巾军所到之处，推翻了地主官僚的黑暗统治，实现了这种革命的转化，“朱衣人”（代表农民的红巾起义军）就要翻身作天下的主人。

“民起怨，事必变”的历史辩证法，朴素地表达了革命农民深入观察历史事变所得出的革命结论。列宁指出：“劳动农民在几百年的过程中养成了一种敌视和仇视这些压迫者和剥削者的心理”。“这种仇恨长期隐藏在闭塞的、迟钝的、无知无识的奴隶的心中，奴隶们一旦意识到自己的可耻的奴隶地位，这种仇恨就会引导他们去建立最伟大的历史功勋。”（《世界政治中的引火物》）红巾军用“天下反”、“事必变”的革命号召，点燃了广大农民心中的仇恨火焰，动员和组织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封建黑暗统治实行了猛烈的冲击。“满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里无一人（指地主官僚），红军府上

^①《元史·五行志》。杨慎《古今风谣》作“塔儿红，南人来作主人公”。

坐！”^①这种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生动地表现出在群众斗争大风雨中的农民革命哲学的巨大威力。

“摧富济贫”、“杀尽不平”的暴力革命论

元末起义农民直觉地认识到，社会的“不平”必须反，社会的现状必然变。但怎样才能实现这种“变”呢？他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結合上回答了这个问题：

“天遣魔军杀不平，
不平人杀不平人，
不平人杀不平者，
杀尽不平方太平！”^②

这首气势磅礴的战歌，可说是元末起义农民在革命实践中概括出来的革命逻辑。它表明了被压迫者和压迫者的对抗关系，指出了被压迫者的解放、“太平”理想的实现，只有通过“杀尽不平”的暴力手段。这充分反映出红巾军对暴力革命的必要性的深刻认识。这种通过武装斗争来“摧富济贫”的平等要求，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它是对极端的社会不平等，对富人和穷人之间、主人和奴隶之间、骄奢淫逸者和饥饿者之间的对立的自发的反应”。（《反杜林论》）

元统治者对“民起怨”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一方面鼓吹儒家的“中庸”，佛教的“慈悲”，高唱着“和”字经和“忍”字经，借以麻痹人民的斗志；一方面严令收缴民间弓箭兵器，乃至铁尺、铁杖、菜刀等，彻底解除人民的武装；妄图这样来维持反动的封建统治。在反封建的斗争实践中觉醒了的

^①陶宗仪：《辇耕录》卷九

^②陶宗仪：《辇耕录》卷二十七

农民，日益认识到只有“倡义举兵”，用革命的暴力战胜反革命的暴力，才能把“不平”的黑暗社会变为“太平”的光明社会。“杀尽不平方太平”，就是说，必须用革命暴力推翻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建立起农民革命政权，实行“摧富济贫”^①纲领，消灭吃人的剥削者，“太平”理想方能实现，贫苦人民才得翻身。贪婪残暴的封建统治者从来就没有实行过什么“慈善心”，他们从来是依靠暴力来统治和镇压劳动人民的，而他们却豢养了大批反动儒生、喇嘛僧侣，拚命叫嚷什么“戒斗”、“戒杀”、“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虚伪透顶，可恶之极。元末红巾军针锋相对，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斗争哲学，强调了一个“杀”字，正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旗帜鲜明地主张暴力革命。

列宁教导说：“在历史上，没有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不是用暴力来解决的。”毛主席更指明：“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战争，自发地实践着这一伟大的革命真理。元末红巾军总结以往农民革命的历史经验，比较明确地意识到，深受压迫剥削的劳动人民——“不平人”与制造人间不平的蒙汉封建统治者——“不平者”之间，决不是什么“和平共处”的关系，而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指望“不平者”发善心，放下屠刀，完全是幻想，“不平人”的唯一出路，是运用暴力手段，“杀尽不平”。红巾军以“杀尽不平方太平”的简明论纲，揭示了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客观逻辑。这是我国劳动人民自己的哲学遗产中的珍品。

红巾军的斗争哲学，戳穿了儒家的“中庸之道”和佛教的“众生平等”之类的骗局，武装了奋起斗争的广大农民，他们

^①《嘉靖邵武府志》卷二

高举大刀长枪，杀向地主官僚，所到之处，“杀守令，据城邑”，“见富人如仇，必欲焚其屋而杀其人”^①；对地主官僚及反动儒生实行坚决镇压，杀出了一个“当年大姓家，存者无八九”，“王公甘久辱，奴仆尽开颜”^②的大好局面。“火飞华岳三关破，血染秦川万马奔。”^③红巾军坚持武装斗争十三年，“大小数百战”，对蒙、汉地主阶级给予了沉重的打击，终于摧垮了元王朝的黑暗统治，为明代初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对封建社会末期的哲学斗争和农民革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①卢琦：《圭峰集》卷下

②李贽本：《一山文集》卷一

③戴宾：《峨庵集》卷四

十、明末闯王李自成“射天” “除暴”的战斗唯物主义

明中叶以来，我国封建社会已进入它的衰落时期，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社会矛盾空前尖锐。以皇室为首的一小撮贵族、官僚大地主无限制地兼并土地，迫使大批农民破产流亡，明王朝疯狂的赋税掠夺，“搜括之令，多如牛毛，”^①搞得“三家之村，鸡犬悉尽。”^②广大人民生活陷入绝境，出现了空前严重的社会危机。为了维护腐朽的封建专制，明统治者一方面豢养了二百多万反动军队和十多万特务，以加强对人民的暴力镇压；一方面又依靠儒、佛、道合流的宋明道学唯心主义，实行残酷的思想统治。靠屠杀农民起家的大刽子手王守仁，更炮制了一套从“破山中贼”到“破心中贼”的反动哲学，妄图用孔孟之道来绞杀广大农民心中的革命意识，瓦解农民革命运动。但这一切，丝毫也阻挡不了人民的革命怒潮。

明中叶以来，各地农民、流民、矿工、织工的暴动，连绵不断。如十五世纪中期以邓茂七为首的农民和矿工的联合起义，自号“铲平王”，要求“铲主仆贵贱贫富而一之”；^③十六世纪初期，刘六、刘七领导的起义，高举着“重开混沌之天”的战旗，^④转战于黄河、长江下游各省，“纵横数千里，所过

①顾炎武：《日知录》

②《明史·王宗沐传》

③《西河文集·厨莹录一》

④《皇明贤治通纪》卷三十三

若无人。”^①到一六二七年三月，陕西白水县农民王二，率领饥民，冲进澄城，击杀知县，打开牢狱，举起了革命造反的大旗，在陕北高原上，点燃了明末农民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李自成就是在革命烈火中锻炼出来的卓越的农民革命家。

闯王李自成（公元一六〇六——一六四五年）出身于陕北米脂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给地主放羊，受尽穷困欺辱，悲惨的经历培育了他反抗封建统治的革命意志和斗争精神。一六二九年，正在甘肃当兵的李自成，被陕北高原兴起的农民革命风暴所唤醒，带领部分边兵，倒戈加入了农民军。他初投王左挂部。当一六三〇年王左挂接受了明官军的“招抚”，他便毅然脱离，改投张存孟部；不久张存孟在明官军的围击下作了可耻的叛徒，他又率余部冲出重围，投奔闯王高迎祥。从此，在闯王部下，转战南北，屡立战功，号称“闯将”。一六三六年秋，高迎祥在战斗中不幸牺牲，李自成被拥戴为“闯王”。他接过绣着“闯”字的战旗，领导北方农民军的主力，开始了新的战斗。经过八年奋战，终于在西安建立了“大顺”农民政权。接着指挥百万大军，直捣北京，埋葬了腐朽的明王朝，宣告了农民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

李自成在长期领导农民革命的进军中，不仅反映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制定和实行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使革命力量由弱变强，革命战争由败转胜；而且不断地总结实践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高举“闯”字大旗，抛弃任何宗教外衣，蔑弃天命，否定神权，用战斗的唯物论武装广大革命农民，并在革命战争中形成了一套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闯王李自成的光辉思想和革命实践，对我国农民

^①《皇明资治通纪》卷三十三

革命哲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除暴”、“均田”的反封建纲领

宋明道学唯心主义所维护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实质是以皇帝为首的一小撮贵族官僚大地主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残暴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明代后期封建统治的极端黑暗和土地的高度集中，充分暴露了宋明道学的反动性。

闯王李自成在领导农民革命中，鲜明地提出了“除暴恤民”的政治纲领和“均田免粮”^①的经济纲领，把斗争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把宋明道学用以维护封建统治的“纲常万年，磨灭不得”以及“存天理，灭人欲”之类的反动说教从根本上加以否定，使农民的革命纲领，具有了更鲜明的反封建性质和内容，从而发挥了更巨大的动员、组织作用。当李自成一六四〇年在河南提出“除暴”、“均田”的纲领并加以实践，“盼星星，盼月亮，盼着闯王出主张”的广大贫苦农民，热烈拥护，“荷旗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②从此打开胜利的局面，显示出这一纲领所具有的深厚群众基础。

“除暴恤民”的政治纲领，体现了革命农民的阶级原则。

“除暴”就是要铲除骑在人民头上的贵族官僚、豪绅地主，推翻封建暴虐统治。“恤民”就是关心群众的疾苦，保护广大劳苦人民的利益。李自成领导义军所到之处，“不杀平民唯杀官”，明皇族宗室被镇压了十分之九，严惩一切“酷虐人民”的贪官豪绅及反动儒生。义军攻克洛阳，在公审处决罪恶累累

^①《明季北略》卷二十三

^②郑廉：《豫变纪略》卷三

的藩王朱常洵时，李自成亲向群众宣布：“王侯贵人，剥削穷民，使其冻馁，吾故杀之，以为若曹”。^①这是代表广大劳苦人民对封建剥削阶级的宣判。同时，义军将没收藩王官绅搜括的大量粮食金银，全用来散赈贫民；并规定“过城邑不得室处”，“不得私藏金银”，“马腾入田苗者，斩”等严肃的军纪，不准扰民。李自成更是以身作则，“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②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政治本色，并多次强调：只是为了百姓，“才起义兵”。表现了优秀的革命品质和高度的革命觉悟。

李自成从“目击憔悴之容，切身痼瘵(音通关)之众”^③的社会经历中，认识到王侯、地主与广大农民之间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劳动农民之所以受冻馁，不是由于自己的命不好，而是由于“王侯贵人，剥削穷民”；地主官僚之所以能够“掳掠民财”，^④对劳动农民进行“吸髓剥肤”^⑤的剥削，就是由于有封建地主阶级政权撑腰。李自成总结以往农民革命的经验，针对现实的社会矛盾，明确提出了“据中原，取天下”的战略思想，“建国立业”，即建立农民革命政权，以与明朝反动政权相对抗，进而夺取全国政权，作为自觉的革命目标；意识到必须用农民革命专政代替地主阶级专政，才可能贯彻“除暴”、“均田”的政纲，运用革命政权来压迫压迫者，剥夺剥夺者。

“均田免粮”的经济纲领，既体现了剥夺剥夺者的原则，更触及到封建制度的核心——封建土地所有制，表现出李自成

①赵士鐸：《甲申纪事》

②《明史·李自成传》

③李自成永昌元年诏，见孙贻《平寇志》卷九影

④李自成撤文，见《明季北略》卷二十

⑤同上。

把历代农民起义的“平均”、“平等”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列宁指出：农民的土地要求，是“**历尽千辛万苦经过多年压迫所锻炼出来的要求**”。（《社会民主党在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在中国农民革命史上，唐以前的农民运动，以反对奴隶制残余的人身依附关系和沉重的赋税徭役为主要内容；唐末黄巢起义，第一次在战旗上写上了“均平”要求；宋元时期的农民大起义，把“均平”要求具体化为“均贫富”、“摧富济贫”，仍着眼于钱粮等生活资料的均分。明中叶以来，农民的抗租、夺地斗争风起云涌，李自成适应农民革命的发展，抓住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均田”的纲领，着眼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对这种平分土地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给予高度的评价，肯定它具有“**革命民主性质**”，是“**农民运动中最革命的思想**”，表现了“**为了完全推翻地主权力和完全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而斗争的农民力求平等的革命愿望**”。（列宁：《纪念赫尔岑》）“免粮”就是反对地主阶级国家对人民的横征暴敛。地主阶级庞大的国家机器是依靠对广大人民的高额赋税掠夺来维持的，所以“均田免粮”纲领反映了农民要彻底铲除封建制和发展个体农民经济的要求，符合当时历史前进的方向。在广大贫苦农民“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的欢呼声中，李自成领导农民军所到地区，“以割富济贫之说，明示通衢。产业不论久近，许业主（农民）认耕”。于是“一邑纷如沸釜，大家（地主）茫无恒业”。^①广大农民起来“瓜占”了地主的田产、牛只；这种大张旗鼓地

①丁耀亢：《出劫纪略》

宣传“割富济贫”的原则，放手发动贫苦农民起来夺地分田的空前革命壮举，猛烈冲击了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统治，冲出了一个“奴坐于上，主歌于下”，^①“纲常法纪，扫地无余”^②的大好局面。

“闯”字当头的战斗唯物主义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大革命，有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没有利用任何宗教思想和宗教组织作斗争手段，而是直接针对社会现实矛盾，明确提出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来动员和组织群众。这在中外农民革命史上都是罕见的。这一方面是由于明末社会危机的严重和阶级矛盾的激化，已具备直接点燃农民革命烈火的条件，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农民革命领袖李自成，在斗争中形成了坚定的战斗唯物主义思想。

李自成反天命的战斗唯物主义思想具有深刻的阶级基础。出身社会底层的李自成，从自己的苦难经历，切身感受到广大劳苦人民中正酝酿着多么深厚的革命反抗精神。因此，他少年时就立志要“横行天下，自成自立”，^③即要“推翻压迫者，使自己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斯大林：《悼列宁》）从董仲舒以来的封建卫道士企图用“神权”所维护着的“政权”和“族权”来束缚农民，宋明道学家们更成天哼着“惩忿窒欲”，“听天安命”等，妄想扑灭农民反抗的怒火。李自成一脚踢开“天命”“神权”之类的谎言，认定被压迫人民只有靠自己的力量，在斗争中求得解放，打翻封建统治，建立自己的政权，成

①张桂：《流寇纪》

②《长治县志》

③《明史·李自成传》

为历史的主人。这种“自成自立”的思想，是秦末农民“吾自举”革命精神的继承和发扬，表现出李自成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战斗性。

李自成的战斗唯物论的思想，集中表现在一个“闯”字上。他初称“闯将”，后为“闯王”，用“闯”字来称呼自己领导的起义部队。在“闯”字的战旗下，李自成打仗从来是冲锋在前，“百万之众，唯自成马头是瞻”^①。这个“闯”字，集中体现了起义农民决心“闯破天罗，掀开地网”，冲翻封建统治的“历史首创性”，正是农民革命“冲天”思想传统的高度发扬。宋明道学家们，拼命鼓吹对“三纲五常”要“勇于从而顺命”，要“顺天”，“顺理”，妄图用一个“顺”字来扼杀劳动人民的反抗意识和革命精神。李自成针锋相对，始终高举“闯”字大旗，用一个“闯”字来概括自己反天命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并用以教育部队，武装群众，唤醒和鼓舞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斗志，就是要把吃人的封建制度闯个落花流水，把反动官军闯个人仰马翻。只有通过“闯”，才能实现“除暴”、“均田”的纲领。正是这种战斗的唯物主义彻底否定了孔孟程朱“畏天命”，“存天理”，“视听言动，非理不为”之类的反动说教，并在革命实践中，把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结合起来，闯出了农民的道路。早在一六三五年攻克明中都凤阳时，李自成就下令焚毁了明皇陵及龙兴寺，把明统治者编造的所谓“承天应运”之类的神话烧得灰飞烟灭。李自成发布的革命文告，全都从政治上揭露明王朝的腐朽罪恶，阐明农民军的纲领政策，从没有任何假托天命神意之类的词句。义军攻克“承天县”，李自成下令改为“扬武州”；^②攻入北京后，李

①《明史·李自成传》

②《明史·李自成传》

自成骑马入城，看到“承天门”匾，便对着“天”字，弯弓怒射。^①所有这些，表现了李自成“射天除暴”的战斗唯物主义的实践性。

“闯”字当头的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使李自成具有了在艰难困苦中毫不动摇的革命坚定性。一六三八年明王朝阴谋调集全国兵力对农民军实行“十面张网”的疯狂大围剿。起义军中少数不坚定分子在敌人的威迫利诱下掀起一股投降变节的逆流，李自成的部将刘国能等叛变投敌，连当时农民军主力之一的张献忠部也接受了“招抚”。李自成则抗逆流，顶恶浪，与敌人奋战，失利后仅与十八骑战友突围，暂伏陕南商洛山中，决不屈服。后于一六四〇年转入巴东山区，明兵部尚书杨嗣昌亲率重兵包围，并狂妄地发出一道檄文，要李自成前去归降，李自成横眉冷对派来的使者，把檄文一把撕得粉碎，并把明皇帝朱由检，杨嗣昌之流痛骂了一顿，打击了敌人的凶焰，坚定了将士们战斗到底的决心。经过浴血奋战，仅率五十余骑冲出重围，终于扭转整个战局，为明末波澜壮阔的农民革命战争奠定了胜利的基础。一六四三年，明湖广巡抚李振声以投降方式钻进农民军，竟异想天开，想用“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天命”说教来恫吓、劝降李自成。李自成愤怒地把他斥为“白痴”，义正词严地指出：“我起兵造反是形势所迫，无数穷苦兄弟挨冻受饿，走投无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不反不行。”又说：“穷人不信天命，全靠自己干，敢起来造反，还怕天么！”李自成所以能够坚持反剥削、反压迫，反招安，反投降的农民革命路线，正因为有不信天命信革命的斗争唯物主义作为世界观基础。

^①《小腆纪年》卷四

不同阶级的世界观，决定了根本对立的“顺逆”观。程朱之流胡诌什么“天即理”，“天命”就是“天所赋之正理”，把维护封建剥削压迫的“三纲五常”说成是“顺天”、“合理”，把劳动人民反剥削、反压迫的正义斗争咒骂为“大逆不道”，诬蔑农民军是“逆贼”，“逆闯”。李自成对这种反动的“顺逆”观，给予了针锋相对的回击。一六四四年元旦，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立革命政权时，特意立国号“大顺”，建元“永昌”。^①表明农民革命政权顺应广大劳动人民的要求，顺应历史的潮流，将永久昌盛。农民革命政权一方面对皇室、贵族、反动官绅实行严厉镇压，使“大家贵族”，“覆宗绝祀者，不可胜纪”；^②另一方面使劳动群众扬眉吐气，夺回部分土地和劳动果实，不仅当时大快人心，大顺人心，而且事实上也顺应了历史的大方向，为社会的前进开辟了道路。李自成这种革命的“顺逆”观，符合客观历史实际，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战略战术中的朴素辩证法

李自成从一六二九年参加起义军，到一六四五年壮烈牺牲于湖北九宫山，在这十六年的战斗岁月里，他领导农民起义军从几十骑发展到百万大军，其中经历了大小数百次艰苦卓绝的战斗，终于取得推翻明王朝的伟大胜利。他不仅是杰出的农民领袖，而且也是卓越的军事家，他所制定的战略战术中，闪耀着朴素辩证法的思想光辉。

一六三五年一月，在各路农民军首领参加的“荥阳大会”

①《明史·李自成传》

②张铨：《流寇记》

上，讨论反围剿的战略方针，意见分歧。青年“闯将”李自成激昂地说：“一夫犹奋，况十万众乎，官军无能为也！宜分兵定所向。”^①得到大会的一致赞同。这一“分兵定所向”的战略部署是从当时的具体条件出发，指明了在反围剿战争中，兵力的分与合的辩证关系。当时明朝统治者“尽天下之力”来围剿农民军，处于战略上的攻势，农民军则被敌军围剿，处于战略上的防守。“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着。”（毛主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分兵定所向”的战略方针不是分散兵力，恰好是要求把十三家七十二营的分散兵力集中起来，然后分成几个大的方面军，统一指挥，发挥最大的主观能动性，协调行动，定向进攻敌人。这就可以将敌军对农民军的一个大围剿，改为农民军对敌军的许多各别的小围剿，将敌军对农民军的战略上的分进合击，改为农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分进合击；将敌军对农民军的战略上的优势，改为农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将敌军战略上处于强者主动的地位，使之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被动地位；将农民军战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变为战役上或战斗上的强者地位。李自成提出的这一战略方针，体现了“‘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毛主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军事辩证法。从而使农民军取得了主动权，粉碎了明官军这次所谓“五省联防”的反革命围剿。“荊阳大会”是我国农民战争史上的伟大创举，它显示了革命力量的大联合。李自成一在会提出的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和战略方针，促成了大会的成功，表现了他长期战争实践中

^①《明史·李自成传》

积累的朴素军事辩证法思想正日趋成熟。

毛主席指出：“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在革命战争中，由败到胜是一个曲折的转化过程。李自成朴素地认识到失败和胜利的辩证关系。一六三八年战斗失败后，李自成与刘宗敏等少数战友隐伏商洛山中，革命处于低潮，他却一再地对战友们说：“从前刘邦百战百败，而终得天下，只要我们坚持下去，也一定会胜利。”从失败中看到胜利的因素，不怕挫折，坚持斗争，用革命战争由失败到胜利的辩证转化观来鼓舞、教育农民军将士，坚定他们对革命必胜的信念，带领大家白天练武，晚上读书，总结历史上农民战争和自己十年来起义斗争的经验教训，积极为革命从失败转化到胜利而创造条件。“收拾残破费经营，暂驻商洛苦练兵。月夜贪看击剑晚，星晨风送马蹄轻。”李自成后来在西安所写的《商洛杂忆》这首诗中，充分表现出他用朴素的辩证法来分析革命斗争中的败和胜，因而对革命前途充满着无比坚定的信心。

李自成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还表现在领导作风上，注意集思广益，多谋善断。李自成身为“闯王”，但从不主观武断，“凡事皆众共谋之”。^①每当决定重大问题，总是“集众议之”，而且暂时“不定可否”，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让大家各抒己见，然后“阴用其长，人多不测”。^②即正确集中意见，深谋远虑，作出决策。可以看出李自成懂得“兼听则明”的道理，坚持了正确的认识路线。一六四三年，在襄阳军事会议上，研究制定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方针，将领们提出三种方

①《明季北略》卷二十

②《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八

案：一种主张先取河北，直攻北京；另一种主张南下金陵（南京），切断粮道，围困明政府；李自成的老战友顾君恩提出第三种方案认为：直攻北京失之急，南下金陵失之缓。应该先取关中地区——这是农民军的老家，以陕西为根据地，建立政权，然后进击山西，再取北京。这样进退有余，可以立于不败之地^①。李自成对三种方案进行认真的比较，终于决定采纳第三种方案。这一重大决策，表现了李自成对于革命战争的战略中进与退，攻与守的辩证关系有一定深度的认识，因而毅然决定指挥农民军，实行战略大迂回，由襄阳进军西安，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关中地区，“建立基业”，再由西安北上山西，攻取北京。体现了“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的“军事运动”（毛主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辩证法，并注意到了依靠人民群众和建立根据地，因而能够取得基本全歼明官军的最后战略决战的巨大胜利。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李自成按照“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条科学的真理指挥战争，非常注意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每攻取城市，总是派农民军战士化装入城与当地群众相配合，以求充分掌握敌情，然后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作战方案。如攻取北京前，李自成便不断派遣农民军战士潜伏进京，侦察敌情，朝廷有所谋议，很快便到了数千里以外的李自成手中。进京第二天，就召集父老开调查会，访问民间疾苦，了解反动派溃逃的情况。这些革命实践中的朴素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思想，正是李自成指挥百万大军取得辉煌战果的世界观基础。

李自成领导的波澜壮阔的明末农民大起义，摧毁了明王

①：《明史·李自成传》

朝，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加速了日趋没落的封建社会的崩溃和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对历史的前进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革命风暴中产生的革命哲学，以李自成的光辉思想为代表，把农民革命的思想理论基础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所表达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作了历史准备；同时，以巨大的批判威力冲垮了宋明道学的反动统治，促进了哲学战线上儒法斗争的开展，为清初法家唯物主义思潮的兴起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

十一、太平天国革命英雄 “杀绝妖魔”的斗争哲学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肆无忌惮地侵入中国，古老的封建帝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中国封建经济基础的解体，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更加激化，广大人民在苦难中惊醒起来。正如马克思当时指出的那样：“**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在中国，在这块活的化石上，就开始闹革命了。**”（《中国记事》）反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斗争不断高涨，反对清王朝黑暗统治的武装起义此伏彼起。鸦片战争后十年内，我国南北各省汉、苗、回、壮、彝各族劳动人民，纷纷以捻党、白莲教、天地会、拜上帝会等作为组织形式，广泛发动了反清斗争，一八五一年，终于汇合成震撼全世界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

太平天国革命领袖，天王洪秀全（公元1814—1864），是出身农民家庭的贫苦知识分子。1843年开始秘密进行革命活动，1845年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革命著作，改造利用原始基督教中的平等观念，结合中国农民革命的思想传统，创造出新的批判武器，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1851年，经过长期的组织准备，洪秀全领导下的农民军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宣布起义，不到两年就发展到几十万大军，横扫长江中下游，给国内外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被马克思赞为“**强大的革命**”。（《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53年在天京（今南京）建立的太平天国农民革

命政权，制定和实施了空前明确的封建革命纲领，英勇地抗击了国内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势力的联合进攻达十一年之久，把我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战争推向了最高峰，同时，揭开了我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历史序幕。

伟大的革命风暴孕育伟大的革命思想。洪秀全是伟大的农民革命家，是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中国人的代表之一。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把农民革命思想和农民斗争哲学都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在我国哲学史上写下了壮丽的篇章。

“灭清开国”的暴力革命思想

太平天国革命英雄们继承历代农民革命传统，坚持农民革命路线，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的清王朝，在理论和实践上明确地把推翻封建政权作为革命的目标。太平军向清王朝发出了“讨胡”“诛妖”的革命檄文，愤怒声讨清朝统治者实行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重重罪恶。揭露封建统治者把中国的大好河山，变成了人间地狱，贪官污吏“剥民脂膏”，“富人当权，豪杰绝望。”^①太平军明确宣布：“满妖威丰”是中国人民的“世仇”，是起义农民“必诛”的妖贼。号召各族劳动人民“各各起义”，“同心同力以灭清”，“扶天王以开国”。^②在这里，太平天国英雄们明确地提出了“灭清、开国”的革命路线，要坚决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建立共享太平的新国家。

洪秀全认识到，太平天国革命是一场革命农民同封建妖魔的生死斗争。反动的封建统治者全是一些“作怪多变”的“老蛇妖

①《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

②《奉天讨妖救世安民谕》

鬼”^①，他们既残忍，又狡猾，对劳动人民决不会发“善心”，行“恕道”。只有采取暴力手段“扫除妖孽”，^②人民才能翻身得解放。他不断用暴力革命思想武装群众，发动群众。在酝酿起义时，他就写下了气势磅礴的战斗诗篇：“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③“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④要达到“四海为家”“共享太平”的理想社会，只有拿起“三尺剑”，掌握“杀伐权”，进行血与火的战斗。他号召“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齐杀妖”。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同封建统治者展开殊死的斗争，实现自己的志愿。洪秀全的这种暴力革命思想，集中地体现在他写的一付对联里太。太平天国农民政权靠什么实现？他写道：“造亿万年太平天国于弓刀锋镝之间”。^⑤清楚地表明，实现革命理想，靠的是“弓刀锋镝”，即武装夺取政权。在建立了革命的政权后，洪秀全没有放下刀把子，主张“杀绝妖魔”，坚决镇压阶级敌人和内奸叛徒的破坏活动。这种誓把妖魔鬼怪“擒尽”“杀绝”的彻底革命观点，把元末红巾军“杀尽不平方太平”的暴力革命思想发展到了新的高度。

太平天国革命军一登上政治舞台，就面临着两个敌人——封建势力和西方殖民主义。在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洪秀全制定了“灭清开国”、“统治斯土”^⑥的农民革命路线，不仅同清王朝进行了持久的武装斗争，而且还痛斥了民族投降主义路线的罪行。他清醒地认识到：有帝国

①《原道觉世训》

②《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

③、④洪仁玕：《洪仁玕自述》

⑤洪秀全：《永安突围歌》

⑥《太平天国轶闻》第一册洪秀全《对联八付》

⑦《谕英使文翰》

主义者的侵略，中国就得不到安宁，如不赶走这些强盗，中国就有亡国的危险。“待驱欧美非澳四洲人，归我版图一乃统”。^①从洪秀全这首对联中，清楚地看到他坚决的反侵略思想。基于这种爱国思想，他号召全体太平军将士“人人当奋勇与敌人及其番鬼盟军”战斗到底，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殖民主义者的政治诱骗和武装进攻。在发动起义中，洪秀全改造利用了基督教，他深刻地认识到，帝国主义者宣扬的基督教是愚弄中国人民的精神鸦片，是竭力诱使革命人民放下武器，屈服于殖民主义者统治的毒品。因此，他对基督教传教士们的欺骗，进行了坚决斗争。当英国传教士力图诱骗洪秀全放弃革命理想，改信西方的基督教时，洪秀全断然拒绝道：“中国人有自己的骄傲，不愿从外国人手中接受福音。”当英国殖民主义者诱骗洪秀全联合天清、“平分”中国时，洪秀全又坚定地拒绝道：

“我争中国，欲想全图”，决不“引鬼入邦”。农民领袖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粉碎了外国豺狼们的阴谋诡计，显示了我国劳动人民坚持独立“自举”、实现革命“大计”、建立农民革命统一政权的英勇豪迈气概。当殖民主义者利诱不成，狂叫要支持清朝政府来扑灭革命时，太平天国革命英雄们横眉冷眼，义正严词地回答：“尔等如助满人，真是大错。但即令助之，亦是无用的。”对这些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豺狼表示了高度的轻蔑。正是在这条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太平军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把殖民主义者的“常胜军”、“常捷军”打得落花流水，使之统统成了常败军。马克思当时热烈称赞太平军抗击侵略者的英雄气概时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

①（《太平天国铁图》第一册）洪秀全《对联八付》

（《中国记事》）

太平天国革命军坚持反侵略的革命路线，同帝国主义的走狗曾国藩“引鬼入邦”反动卖国路线是针锋相对的。曾国藩在侵略者面前摇尾乞怜，对革命人民却是张牙舞爪，疯狂反扑。他在日记中恬不知耻地写道：“洋人助我攻剿‘发匪’，实‘有德于我’^①，奴才的狰狞面目暴露得淋漓尽致。

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革命军坚持“灭清开国”的革命路线，同内部以李秀成为头子的投降派进行过多次斗争。早在驻守安庆的时候，李秀成就“易苛制”，改变太平天国的制度，对地主阶级妥协投降。洪秀全得悉后，马上颁布诏令，谴责李秀成，命令他对人民“勿事压迫”，重申“杀绝妖魔”的政治路线。李秀成在窃取苏浙地区军政大权后，排除异己，结党营私，推行一条“依古制而惠四方”、“宽刑以待万方”的阶级投降主义路线；洪秀全又在诏令中痛斥他“不守正道”。对天王的指责，李秀成拒不接受，依然一意孤行，坚持投降路线，为博得升官发财，封妻荫子，最后跪倒在敌人脚下，成为农民革命的可耻叛徒。

混入太平军的阶级异己分子石达开、韦昌辉，为了达到他们篡夺革命领导权、搞独立王国的野心，玩弄阴谋诡计，分裂革命队伍，破坏团结，充当封建统治者的帮凶。坚持革命路线的太平军广大将士，在洪秀全的领导下，一次又一次地同他们进行尖锐的斗争，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他们分裂革命队伍的阴谋。

太平天国英雄们在正确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同中外反动派和内部的投降主义、分裂主义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取得了伟大

^①《曾国藩日记》

胜利的。尽管这场革命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剿杀下失败了，但他们那种“勿惧妖魔奸谋”，暂把妖魔“擒尽杀绝”的革命路线和革命精神是永放光辉的。

“共享太平”的空想社会主义

太平天国革命是旧的农民革命发展的顶峰。洪秀全总结、发展了历代农民革命斗争的经验，制定了伟大的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这个纲领，全面地规定了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所要实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措施，描绘了“共享太平”理想社会的美好图景，即“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朝田亩制度》把我国历代农民反压迫、反剥削，“等贵贱、均贫富”的革命理想更加丰富、具体化了。

《天朝田亩制度》的核心是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按人口平分土地，使“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在废除土地私有制的同时，在分配问题上还规定“天下人人，不受私物”，建立财产公有的“国库”制度，对婚嫁等费用和丧失劳动力及无法生活的人实行供给制，做到“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这些经济原则，是东汉黄巾起义提出的“财产公有”“共养”经济纲领的发展，反映了革命农民反对剥削制乃至消灭私有制的强烈要求。

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保卫“共享太平”的社会制度，在国家组织形式上，这个纲领还规定实行政、教、劳、武结合的制度，使人民生活军事化，共同保卫新生政权，每年每家派一人为“伍卒”，“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无警则首领督之为农。”

《天朝田亩制度》是一个伟大的农民革命纲领。它不仅抓住“王侯贵人”之所以剥削穷人的土地问题，对腐朽的封建生

产关系进行变革；而且体现历代农民“公天下”，“均贫富”的革命理想，提出一整套政治、经济、男女、社会四大平等的主张。在政治上，规定任何人一律平等，人民享有民主权利；经济上，“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实现了“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平等原则”。^①这种“人人平等，男女平等”的主张，否定了三纲五常，否定了封建的等级关系和统治秩序。这对“所憎所爱，一出私”^②的封建地主阶级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孔孟之道维护的封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是一个深刻的批判。尽管由于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这个纲领企图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实现没有压迫和剥削的美好社会，只能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空想，但是正如列宁指出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主张“把全部土地从地主那里夺过来，分给或平均分给农民”，“表达了最彻底地消灭整个旧制度和全部农奴制残余的最坚决、最彻底的愿望”。（《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

“穷苦黎民同庆贺，天军带来太平春”。由于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代表了广大农民反封建的强烈要求，反映社会变革的前进方向，所以它受到了广大穷苦农民的热烈欢呼，却遭到了封建统治者的疯狂咒骂。封建卫道士、大刽子手曾国藩，在血腥镇压太平军的同时，更恶毒攻击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说什么主张人人平等，破坏了“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封建等级秩序；主张平分土地、公有财产，破坏了封建剥削制度；他狂叫这是使“中国数千年来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

①洪秀全：《原道醒世训》

②洪秀全：《原道醒世训》

原。”^① 阶级敌人的疯狂叫嚣，正表明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在横扫封建纲常的斗争中发挥了空前巨大的思想威力。

《天朝田亩制度》所描绘的“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社会理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它企图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通过平分土地来消灭剥削、压迫乃至消灭私有制，实现“人人不受私”、“无处不均匀”的平等社会，这是不可能的，但这一纲领的实质，则在于它要求彻底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在当时具有重大的革命意义。列宁在分析民粹派乌托邦时指出：平分土地的要求，实际上是广大农民群众的“民主主义高涨的伴侣和象征”，“马克思主义者应当透过民粹派乌托邦的外壳细心辨别农民群众真诚的、坚决的、战斗的民主主义的健全而宝贵的内核。”（《两种乌托邦》）正因为这样，当马克思、恩格斯了解到太平天国的革命理想时，曾给予最热情的赞扬，指出这种“中国的社会主义”，标志着“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国际述评（一）》）

“革故鼎新”的社会变革思想

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生死斗争，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就形成两种对立的世界观的斗争。太平天国的革命变革思想在哲学形态上是朴素唯物论和自发辩证法思想。它同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理学唯心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历代封建统治者总是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反动形而上学，妄图以此论证“三纲五常，终变不得，”维护反动统治，抵制社会变革。

^①曾国藩：《讨粤匪檄》

维护腐朽清王朝利益的封建卫道士曾国藩也跟着狂叫什么：“唐虞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①按照他的意思，封建统治者永远是统治者，封建社会的秩序永远不可改变，把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说得更加形象。

但是，革命的农民根本不理睬这一套，洪秀全在发动起义前写的《原道觉世训》中，首先从阶级对抗的客观现实出发，提出“帝妖对立”的斗争哲学。他把人间一切对立斗争，概括为“皇上帝”同“阎罗妖”的斗争，“皇上”不是别的，它是农民革命力量的代表，是正义和真理的化身，同西方资产阶级宣扬的基督教的“上帝”有着原则区别。“阎罗妖”则是一切反动腐朽势力的代表，是社会上一切牛鬼蛇神的总后台。洪秀全号召起义农民拥护“皇上帝”的权威，相信自己的力量，大胆起来造反，去推翻“阎罗妖”所统治的黑暗世界。“皇上帝”和“阎罗妖”的对立斗争，既是一个政治观念，也是一个哲学观念，它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对抗关系在哲学上的反映，是农民革命思想家对现实阶级矛盾的概括和总结，包含着农民革命力量一定要压倒反革命势力的坚定信念。

洪秀全继承并发扬历代农民要变、要革命的思想，接着坚定地指出：“于今夜退而日升矣！……几何乖离浇薄之世，其不一旦变而为公平正直之世也。”“乱报则治，暗报则光，天道也”^②用革命的辩证法的天道观否定了所谓封建统治万古长存的鬼话，明确地宣布：清朝的反动统治，混乱已到极点，黑暗已到极点，太平天国革命就是唤起人们“手握乾坤杀伐权”收拾混乱局面，结束黑暗统治。洪秀全写过一首“反诗”：“龙

① 曾国藩：《讨粤匪檄》

② 洪秀全：《原道觉世训》

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等到风云齐聚会，飞腾六合定坤乾”。^①具有冲天威力的革命农民这条巨龙，经过“潜”、“跃”、“飞”的发展阶段，终究要跃出海底，跃出深渊，乘着革命的风云，在广阔天空里自由地飞腾起来，惊天动地重整乾坤。这首诗，生动而深刻地表达了洪秀全对革命势力由弱到强，天下由乱到治充满了必胜信念的革命世界观。这种“乱极则治，暗极则光”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前期封建社会农民起义提出的“极于下者当反上”的变革思想，同曾国藩的“不可倒置”的反动形而上学针锋相对。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太平天国后期领袖洪仁玕发挥了天王洪秀全的革命辩证法思想，提出了“革故鼎新”的观点。曾国藩狂叫封建秩序“不可倒置”，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就是要来一个根本“倒置”，要把旧世界的纲常名教打个落花流水。洪仁玕论证世界由“旧”到“新”转化的必然性，指出：“云净而月明，春来而山丽，衣必洗而垢去，物必改而更新，理之自然也。”^②事物由旧到新是合乎规律的变化，而实现这一变化的关键在于必须“去垢”，必须“革故”，通过革命变革，就能改造旧事物，创造新天地，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规律。洪仁玕还强调要站在革命立场上才能正确对待新事物，“始能认识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并“喜此新天之理”，否则，摆不脱“旧杂污俗”的束缚，就会认为“新不如旧”而不能“共登光明善域”。^③这种反映破旧立新的时代要求的辩证法思想，极大地丰富了农民革命哲学的武库，对封建顽固派的反动形而上学是有力的回击。

①《洪秀全选集》

②、③洪仁玕：《英杰归真》

在战斗无神论的思想鼓舞下，太平天国英雄们满腔革命怒火，以压倒一切之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孔运动，对维护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进行了革命大扫荡。他们思想大解放，“敢将孔孟横称妖”。革命力量所到之处，“毁宣圣之木主”，变孔庙为屠场；“以狗血淋孔孟之头”，到处燃起了焚烧孔孟“妖书”的熊熊烈火。太平天国还广泛宣传“皇上帝”严惩孔老二的故事，说世间种种罪恶的产生，“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皇上帝甚怒，命天使鞭打他”，孔丘跪在地上，“再三讨饶，哀求不已”。^①剥削阶级的大圣人，成了向劳动人民跪着讨饶的罪犯。太平天国对孔丘的凌辱，对孔孟之道的革命大批判，是思想史上的创举，为以后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先声。太平天国“推翻神权，解放思想”的伟大实践，证明了“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毛主席：《论联合政府》）“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思想和制度，都随着农民权力的升涨而动摇。”（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由于缺乏先进阶级的领导和科学世界观的指导，终于失败了。但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毛主席：《改造我们的学习》），他们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农民革命哲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①洪仁玕：《太平天日》

十二、义和团、红灯照 “扫清灭洋”的革命哲学

甲午战争的失败，充分暴露了封建统治的极端腐朽，帝国主义者乘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人民群众挺身而出，一八九九年，山东平原县农民组成义和团举行武装起义，掀起了震撼世界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孩童个个拿起刀，保国逞英雄。”义和团农民革命运动是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深，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产物，它把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在这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义和团英雄们，用大刀、长矛、棍棒等原始武器，同洋枪洋炮装备的外国侵略军和清政府军队进行了浴血奋战，用革命的暴力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打击了清政府的投降卖国活动，同时也横扫了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封建文化和帝国主义文化的反动同盟，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同志对义和团运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扫清灭洋”的反帝反封建纲领

义和团运动，以相互联结的三个不同的政治口号的提出和

付之实践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从最初提出“反清复明”，接着改为“扶清灭洋”，直到最后提出的“扫清灭洋”的口号，说明了义和团在斗争中经过斗争、失败、再斗争，接受了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训，终于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说明了中国人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浴血奋战，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政府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认识的过程本身是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的。

早在十九世纪末，义和团的前身“义和拳”，“大刀会”等带有神秘色彩的民间组织就提出“反清复明”的口号，在山东一带从事反封建的活动。清朝统治者骂他们是“拳匪”、“刀痞”，企图把他们各个击破。那时的义和团并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但他们不怕清政府的血腥镇压，用“反清复明”的政治口号，鼓舞广大人民从事武装斗争，打击封建统治者。“反清复明”这个口号是有缺点的，受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影响，只强调了汉族人民同清朝满族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在当时国家民族危亡的关头，“复明”已经没有什么号召力了，所以义和团的力量发展很慢。

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普遍高涨，广大农民深感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义和团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反帝爱国要求，作歌谣张贴，号召人民拿起武器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他们豪迈地高唱：“男的拿起刀，女的拿起枪，为的咱们国，为的咱们活。”^①“洋鬼子全杀完，夺回我们的好江山”。^②这时，义和团提出了“扶清灭洋”的政治口号。这个口号，在当时有着较大的影响，它能把除一些叛国分子以外

①《义和团歌谣》《民间文学》1959年3月号第88页。

②《民间文学》1957年第一期第10页。

的各阶层广大人民暂时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集中打击帝国主义者。义和团的队伍迅速扩大，顿时威振中外。清朝反动统治者担心威胁到自己，加上它和帝国主义有一定的矛盾，就施展反革命两手，暂时收敛了对义和团的疯狂镇压，被迫承认义和团的“合法性”，利用义和团的力量，压一压帝国主义，更重要的是妄图借帝国主义的屠刀镇压义和团。同清朝统治者的愿望相反，义和团在反帝爱国斗争中，注意了坚持自己的独立性，没有让清朝政府束缚自己的手脚，它从没有放弃反封建统治的斗争。但是，“扶清灭洋”的口号毕竟是有缺陷的，“扶清”模糊了反封建的任务，以致不少封建统治阶级的爪牙，也打起义和团的旗号，这部分人很快就同帝国主义联合起来镇压义和团。血的教训使义和团清楚地认识到，豺狼毕竟是豺狼，清朝统治者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于是，决然抛弃“扶清”的口号，制定了“扫清灭洋”的政治路线。他们向人民广泛宣传“杀了洋鬼子，再跟大清闹。”^①经过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伟大实践，而提出的这一条政治路线，标志着中国人民把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放到了自己的肩上。中国人民在反帝爱国斗争中，对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清朝统治者的反动本质的认识，来了一个飞跃。这就清楚地说明，义和团运动的领袖们，在分析革命任务，制定革命口号、路线时，坚持了一条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

“不怕鬼”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往往用宗教、文化打头阵。鸦片战争后，殖民主义者派出大批传教士，来向中国人民宣扬西方资

^①《义和团招帖》《历代劳动人民反孔斗争史料简编》第205页。

产阶级文明，灌输帝国主义奴化思想。他们在各地设立教堂，引诱人们信奉天主教或基督教。他们宣扬“上帝”是人间的最高主宰，要人们忍受压迫和剥削，虔诚地向“上帝”“祈祷”，来世就可以进入“天堂”。传教士们廉价地向信徒们抛售进入天国的门票，麻醉人们的思想意识，磨灭其革命斗志，以达到他们既侵略中国人民，又不遭到反抗的罪恶目的。

那些传教士手捧“圣经”，喃喃“祈祷”，口称“与人为善”。其实，他们无恶不作，霸占农民土地，抢夺人民的钱财，杀死无辜的婴儿。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反抗。义和团英雄们看穿了殖民主义强盗的反动本性，指出“鹬子充鸡没有好心肠。”^①他们坚持朴素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宗教世界观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们指出：

“天主堂、耶稣教，作礼拜，真可笑，闭着眼睛瞎祷告，要上天堂办不到，要免罪愆也不可靠。”^②

这里，义和团英雄们深刻地揭露了宗教唯心主义的虚伪性和荒谬性。他们认为“奉上帝”、“祷告”就能上天堂，脱离人间苦难，这是胡说。劳动人民要免除剥削压迫，靠“作礼拜”是永远办不到的。这反映了义和团革命农民注重实际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他们还进一步揭露了宗教唯心主义要人们放弃斗争的反动性。他们说：

“‘你骂我，不反口；你打我，不还手，
你抢我，不叫留；你宰我，不报仇。’
想得好呀想得妙，没人信你的天主教。”^③

深刻地批判了天主教《圣经》里“你打我的左脸，我把右

①《民间文学》1958年5月号20页。

②《山东歌谣集》第一集81页。

③《山东歌谣集》第一集81页。

脸也给你打”的鬼话。义和团英雄们以简单有力的语言，揭穿了宗教的欺骗性，并且在实践中反其道而行之。你骂我，我就还口；你打我，我就还手，你抢我，我就跟你斗；你宰我，我就要报仇。他们愤怒捣毁教堂，打杀传教士，表现了中国人民极大的爱国热情。中外反动派对义和团的革命行动，竭尽攻击之能事，在他们的眼里，义和团简直是一群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怀着极大的义愤，痛斥了帝国主义的强盗逻辑。他说，“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中国的战争》）列宁的话，是对义和团英雄们的反帝爱国行为的极大鼓舞。

义和团英雄们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还突出地表现为“依仗人多不怕鬼”。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统治者相互勾结，依仗他们武器质量好，官兵洋兵数量多，对义和团进行疯狂镇压。义和团英雄们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战略上极端藐视敌人，他们唱道：

“女的红灯照，男的义和拳，赶也赶不散，捉也捉不完。”

“义和团喝白水，依仗人多不怕鬼。”^①

“官兵多、洋兵多，义和团每人一口水，淹死官洋一大河。”^②

充分说明义和团已经认识到人民战争的威力。官兵洋兵多，义和团人更多，男男女女齐动员，就能把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这种思想是极其宝贵的。

义和团继承和发扬了先辈们的光荣革命传统，不只男的拿起刀，女的也拿起枪，动员了广大妇女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义和团里，有专门的妇女组织，青年妇女们组成的“红

①《中国歌谣资料》第一集，156页

②《义和团歌谣》29页。

灯照”，就是里面最突出的一支。她们表现了极大的爱国热情。

“别看女兵女将，专杀东洋西洋。

杀得东洋满天飞，杀得西洋投了降。”①

“妇女不梳头，

砍去洋人头；

妇女不裹足，

杀尽洋人笑呵呵！”②

武装起来的中国劳动妇女，英姿飒爽，具有压倒敌人的威风，是反帝斗争中一支伟大的力量。恩格斯说过：“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成千成万的妇女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可见义和团运动动员之广。

义和团英雄们坚信只要依靠人民的力量，就能够打出一个新世界。他们在战歌中唱道：

“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③

“八千十万神兵起，扫灭洋人世界新。”④

动员绝大多数劳苦大众，扫灭帝国主义，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这就是义和团英雄们革命哲学中包涵的伟大理想。

义和团的英雄们在斗争中显示了绝顶的聪明才智，在战略上极度的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高度重视敌人。他们坚持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见大帮就躲，见小帮就剿。今天砍了俩，

明天杀两对。甭看官洋多，灭了一个少一个。”⑤

①《中国歌谣资料》第一集，155页

②《中国历代农民问题文学资料》第387页。

③《中国歌谣资料》第一集155页。

④《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一期。

⑤《义和团歌谣》87页。

根据敌我双方的力量，决定战争的打法，表现了尊重实际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同时，他们看到了大和小，多和少的辩证关系。帝国主义和封建政府的反动军队表面上是大和多，经过革命人民的主观努力，今天杀一个，明天杀两对，灭了一个就少一个。帝国主义和封建政府的反动军队就会变成小和少，最后就会被全部消灭。这种积小胜为大胜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使革命人民在艰苦的环境里，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鼓舞斗志，坚定信心，去夺取革命胜利。充分显示了义和团的革命哲学的战斗精神。

人分穷富、团分真假的辩证分析法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后，一些封建绅士、商人都打起义和团的旗号，他们“扶清”是真，“灭洋”是假。一心只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并无反帝爱国的热忱。本来这也是革命运动高涨时期，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普遍现象。义和团从革命斗争中逐步认识了这个问题。在一首革命歌谣里，明确揭示了这个问题。有一首歌谣是这样写的：

“义和团，不一般，有穷团，有富团。

穷团穷人建，富团富人建。

穷团砍洋人，富团那里敢。

穷团为百姓，富团为个人。”^①

明确指出了同叫“义和团”，却有穷团富团之分，不是一条心，各自的目的不同。穷团是革命的，砍杀洋人，为百姓；富

^①《义和团歌谣》98—94页。

团是不革命的。只为了在帝国主义入侵面前，借革命的声威使地主阶级的利益不受侵犯。义和团英雄们看出穷团富团之间的矛盾，表现为真反帝和假反帝两条对立路线的斗争。

“真团有真心，假团有假心。

真团保中国，假团保自身。

真团砍洋人，假团接洋人。

真团给中国争气，假团给中国丢脸。”^①

“义和团是穷人团，

穷人个个不简单，

穷人打仗为穷人，

穷人才能保江山。”

穷团和富团就是革命和反革命的两大势力，真团真心“灭洋”保中国；假团假心“灭洋”，暗中勾结帝国主义保住腐朽的封建统治、投降卖国。义和团英雄们通过血的教训，看出了这种真假的差别，但没有果断地采取措施战胜投降派，投降派钻进了革命阵营内部，勾结帝国主义血腥镇压义和团，使革命遭受失败。他们从革命斗争中学到的这种辩证分析法，为中国人民留下了极宝贵的教训。任何时候，革命派都应当充分注意投降派的活动，不能丧失警惕。只有战胜了革命队伍中的投降派及其投降主义路线，才能使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伟大的义和团运动，虽然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共同绞杀下失败了，但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从政治上看，可以说打了一次大胜仗。从此，帝国主义分子不得不承认“无论欧美、日本各个国家，都没有能力能够统治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故瓜分中国一事，实为下策。”

^①《义和团歌谣》94—95页。

这就表明，义和团运动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革命精神，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义和团运动，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历代农民革命运动的光荣传统，它那新颖、活泼的战斗诗歌中处处表现了战斗唯物主义和革命辩证法思想，是中国劳动人民革命哲学中别开生面的篇章。

结 束 语

以上就我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劳动人民的革命哲学仅作了粗略的论述，但已足以表明：历代劳动人民在反压迫反剥削的革命斗争中，适应武器批判的需要，不断地发展着自己的批判武器。

列宁指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剥削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本身和个别‘知识分子’代表中间产生一些与这一制度相反的理想。……这些理想对马克思主义者说来是非常宝贵的”。（《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在中国劳动人民革命哲学的历史发展中，也生动而深刻地表现了这种劳动群众的“理想”和“思想体系”。创造历史的劳动群众，是人类认识的主体。他们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展开的革命的政治批判和哲学批判，既适应历史前进运动的要求，也反映了人类认识运动的深化。从柳下跖痛斥“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根本否定奴隶制，到陈胜、吴广“伐无道，诛暴秦”，反对复辟奴隶制；由前期封建社会起义农民集中反对封建依附关系，到后期封建社会明确提出与封建剥削制度和等级制度根本相反的“均平”理想，终于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而形成了完整的农民民主主义和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与这种政治批判相结合的哲学批判，由否定天命神权，到坚信革命造反有理，不断加深了对自然和社会中客观矛盾运动的朴素认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不断提高了劳动阶级的革命世界观的水平。奴隶和农民在斗争中发展着的

革命世界观，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打倒天”的唯物主义。针对奴隶主和农奴主一贯用天命神权来辩护他们的反动统治和世袭特权，从殷周时代奴隶们“开天辟地”的哲学寓言，对“天”的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到秦汉以来“王侯无种”、“贵贱由人”的反天命思想，进而强调农民革命的“巨人”，能够“知世”，敢于“冲天”，劳动人民以“闯破天罗，掀开地网”的革命实践和不信天命信革命的战斗唯物论，显示了自己的革命哲学的鲜明党性，否定了反动统治阶级宣扬的天道观以及儒、佛、道合力炮制的封建神学，横扫了一切维护反动统治的“天命”、“天理”、“神佛祖先”，“泥木偶象”，促进了广大群众的思想解放。

(二)“事必变”的革命辩证法。劳动人民在斗争中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客观矛盾运动逐步加深认识，从原始“五行，阴阳”说对自然现象的概括，到“极于下者当反上”，“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等对社会运动的认识，进而把现实的社会阶级矛盾抽象为“明暗”、“红黑”、“正邪”、“帝妖”等对立面在斗争中转化的朴素观念，并认识到只要劳动人民团结战斗，实行“天下反”，就会引起“事必变”，实现“夜退日升”、“革故鼎新”的客观法则。这就彻底批判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反动形而上学，表达了觉醒中的劳动群众决心砸烂旧世界，创造“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的革命信念。

(三)“杀尽不平方太平”的暴力革命论。劳动人民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地位决定，他们必然意识到阶级斗争是不可调和的，所谓“中庸之道”、“忠恕之道”完全是欺人之谈，一切“和”字经、“忍”字经也全是掩护反革命暴力的烟幕弹；要实现劳动人民的地位转化，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杀尽不平”，天下才能“太平”。从柳下跖拿起“金锤”砸狗头，

到陈胜揭竿而起“伐无道”，从王薄“提刀向前”杀昏君，到黄巢“起兵问罪”唐天子；从方腊主张“杀人即成佛”，到钟相提出“杀人为行法”；从红巾军的“杀尽不平”，到太平军的“杀绝妖魔”，贯穿了一条歌颂革命暴力、肯定暴力革命的思想红线，充分表现了历史上劳动人民的哲学所揭示的革命逻辑是客观真理的反映。

（四）“小民从来不可轻”的历史观。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实践使劳动人民对自己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有了朴素的认识。古代奴隶们的哲学寓言就肯定，劳动英雄具有“补天”、“射日”、“移山”、“填海”的征服自然的本领。战国时的农民思想家提出“一夫不耕天下饥”，强调劳动者的生产活动关系到天下人的存亡；从秦末起义农民坚信“氓隶之人”“宜为王”，汉末黄巾军宣布“小民从来不可轻”，到元末红巾军欢呼“朱衣人作主人翁”，都深刻地表明劳动人民觉悟到要建立自己的政权，作天下的主人。太平军肯定人民群众的力量能使“阎罗妖鬼都难飞”，义和团肯定“洋人怕百姓”，“穷人才能保江山”，他们藐视一切反动派以及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侵略者，坚信自己能够“手持三尺定山河”。劳动人民这种革命的历史观，有力地批判了“英雄创造历史”以及“上智下愚”之类的反动唯心史观。

（五）“等贵贱，均贫富”，人人劳动，财产公有的社会理想。毛主席指出：“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曾经是世界上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早在奴隶社会，奴隶们就向往着一个自由幸福的“乐土”，在那里“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战国时期的劳动农民的代表提出“君民并耕”的理想，痛斥一切“厉民自养”的剥削制度。黄巾军描绘了财产“共有”、“共养”，一平二公的社会前

景，并曾设置“义舍”、“义米”来加以实践；宋代起义农民鲜明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革命纲领，并实行了耕战结合、财物公有的“馆谷”制度。自从黄巢把“均平”口号写上起义旗帜，经过历代农民起义的发展，由否定封建等级法权的“法平等”，到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均田免粮”，终于在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和“圣库”制度中体现出完整的农业社会主义纲领。当马克思、恩格斯了解到太平天国的革命理想时，曾经指出：“在造反的平民当中有人指出了一部分人贫穷和另一部分人富有的现象，要求重新分配财产，过去和现在一直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国际述评（一）》）并对这种“中国的社会主义”给予了热烈的赞扬。

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在从各个方面对剥削阶级的反动哲学进行猛烈的批判中，锻炼出了自己的哲学武器，形成了自己的革命思想传统。他们留下的这样一些“非常宝贵”的思想遗产，属于“优秀的人民文化”（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是作为历史主体的劳动群众在改造世界中对世界的认识和说明，有着最深厚的实践基础，它代表着人类认识发展的正确方向。它的革命性和批判孔孟之道的彻底性，是任何剥削阶级的进步思想家所不能比拟的。

劳动人民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发展的革命哲学，是当时革命阶级最先进的思想武器。它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都起过巨大的作用。它曾经武装广大群众，唤起革命风雷，发挥过“一呼而天下鼎沸”的巨大的动员组织作用。它以特有的战斗锋芒，对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泡制的各种反动哲学实行革命的批判，横扫牛鬼蛇神，砸碎精神枷锁，使广大群众的思想得到解放。同时，也迫使统治阶级的哲学营垒分化瓦解。反动的儒家哲学遭到革命的致命打击之后，不得不多次改变自己的

形态，更换招牌，变换手法，以继续欺骗人民；而法家的唯物主义哲学，虽受到阶级局限而有其先天的不彻底性，却由于从劳动人民的哲学批判中不断吸取了思想动力，因而能够顺应时代潮流而不断发展。劳动人民革命哲学的这种巨大的历史作用，充分证明了劳动人民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也是包括哲学在内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历来哲学战线上朴素唯物主义和自发辩证法思想阵地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劳动人民的革命哲学，有其不容抹杀的历史贡献，也有其不可避免的阶级局限和历史局限。奴隶和农民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所能提出的社会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生产规模的狭小及与之相联系的自然科学水平的低下，严重局限着他们的眼界，使他们所能提出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只能停留在直观的水平，具有朴素的性质，对自然和社会还不可能通观全局，作出科学的说明；对人类哲学的遗产也还不可能进行全面的批判的总结。这个历史任务，只有工人阶级依靠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彻底革命的科学世界观才能完成。

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地总结我们民族的哲学遗产，认真研我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劳动人民的革命哲学，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封资修的旧哲学史体系，从根本上颠倒了儒法斗争的路线是非和哲学发展的源流关系，既有意贬低法家唯物主义的历史贡献，更一笔抹杀了劳动人民的革命哲学在哲学史上固有的地位。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史阵地，必须把他这两个历史的颠倒再颠倒过来，恢复历史上哲学发展的源流关系和路线是非的本来面貌。只有这样，才能在哲学遗产的研究总结中，贯彻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全面地总结以往哲学战线上阶级斗争和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更好地为现实的阶级斗争和哲学斗争服务。

研究劳动人民革命哲学的过程，是学习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唯心史观的鼓吹者。刘少奇、林彪都是把反动的“天才史观”作为篡权复辟的思想武器，党内形形色色的走资派，都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把广大群众看作“群氓”，他们恶毒地诬蔑革命群众运动，妄图骑在人民群众头上作威作福，他们同样地祭起孔老二的“上智下愚”的“天才史观”，向无产阶级进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神圣家族》）如何看待现实的和历史上的革命群众运动，如何看待革命群众的智慧和首创精神，是每个革命者必须在头脑中彻底解决而又不是轻易能够解决的问题。通过对劳动人民革命哲学史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真正树立起奴隶们创造历史，“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的唯物史观。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

“红旗卷起农奴戟”，“敢教日月换新天”！（毛主席诗词，《到韶山》一九五九年六月）劳动人民的革命哲学，是从血与火的激烈搏斗中诞生的，它凝聚着千千万万奋起造反的奴隶的生命和热血。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那“反中庸”的革命造反精神，那“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愤怒质问，那“冲天”的第一声呐喊，那“提刀向前荡”的豪迈气概，那“杀尽不平方太平”的血战到底的决心，是多么令人钦敬！他们留下的战斗豪言，反动派听了为之胆战心惊，革命人民听了为之精神振奋。承继这一份珍贵遗产，用马克思主义加以熔铸和改造，对于我们树立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世界观是多么重要的借鉴！我们今天要以无产阶级的“冲天”革命精

神，坚决与孔孟之道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坚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在事关路线、事关大局的问题上决不调和折中，坚定不移地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奋战到底！

历史证明，劳动人民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与反动思潮斗的革命实践，是哲学思想发展的根本动力和主要源泉。劳动人民是哲学的主人。历史上的劳动人民用自己手中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思想武器，扫荡了貌似强大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求得了一定程度的思想解放，因而取得了奴隶起义和农民战争一次又一次的巨大胜利。通过这样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毫无疑问，可以加深我们对毛主席关于“哲学解放”的伟大号召的理解。今天，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广大工农兵正在成为真正的自觉的哲学主人。解放了的劳动人民，正在为哲学的解放而斗争，正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伟大的认识工具”“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一切地主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机会主义的头子刘少奇、林彪之流妄图阻挠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革命群众相结合的阴谋，乃至今天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反对“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转引自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的各种奇谈怪论，都无法阻止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的哲学解放的革命洪流。我们坚信，打破封资修的旧哲学史体系，恢复劳动人民在哲学史上的地位，认真研究、总结历史上和现实中劳动人民掌握和运用哲学的具体经验，将会促进哲学的解放，有助于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更好地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